

1937 至 1947 年在北京的台灣人*

許雪姬**

摘 要

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海外活動，是台灣史構成的重要部分，因此在華南、重慶、「滿洲國」的台灣人都已有人研究，但做為故都的北京，迄未有人進行。1937-1945 年這八年間，在日本占領下的北京有多少台灣人？據日本政府的統計大約有 500 多人，這些人何以到北京？從事何種行業？戰後的遭遇如何？這是本文所要釋明的。本文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台灣人的旅券資料、日本政府對旅外日人（包括台、韓）的逐年統計資料，參以有北京經驗的台人日記、小說、雜文，及口述歷史來進行研究。

關鍵詞：北京、台灣人的海外活動

* 本文曾在 2003 年 10 月 24 日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之「江文也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中發表，承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羅久蓉評論，謹致謝意。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E-mail: mhsoat@gate.sinica.edu.tw。

1. 前言

十多年前我開始對日治時期到中國大陸的台灣人的活動感到興趣，他們爲什麼去？去那裏？從事什麼行業？有什麼特別的遭遇？戰爭後選擇回台還是留在當地？留在當地的如何經歷中共的反右運動乃至於文化大革命？而回台的是否參加二二八或是遭到白色恐怖的迫害？還是能將在中國大陸的經驗帶回台灣，有利於台灣戰後的發展。有關這方面已經有學者做過研究，就區域分佈看，以研究台灣人在華南的爲多，因爲華南的廈門、福州、廣州、汕頭是台灣人的原鄉，也是海外台灣人占最多比例的地方，如中村孝志、¹ 若林正丈、² 梁華璜、³ 鍾淑敏、⁴ 等人的研究；如果以參加國民政府抗日陣營在重慶的台人爲例，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張瑞成編有相關資料，⁵ 而這些戰後被稱做「半山」的台灣人自然不乏研究的學者，如李雲漢、⁶ 呂芳上、⁷ 林德政；⁸ 研究華北的則有秦賢次，介紹早期到北京留學的台灣人。⁹ 我個人也對到「滿洲」¹⁰ 的台人做過一些訪談，集成《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一書，¹¹ 包括 28 個人的證言，另也出版〈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醫生〉一文、¹² 〈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其認同〉¹³ 等主題。從過去的研究成果看來，戰爭期間在北京的台灣人尚有一些研究的空間。

¹ 中村孝志 (1985)，頁 115-137。

² 若林正丈 (1987)，頁 99-112。

³ 梁華璜 (2001)。

⁴ 鍾淑敏 (1999)，頁 695-733；鍾淑敏 (2004)，頁 400-451。

⁵ 張瑞成 (1990)。

⁶ 李雲漢 (1971)，頁 66-314。

⁷ 呂芳上 (1971)，頁 21-28；呂芳上 (1973)，頁 255-316。

⁸ 林德政 (2001)，頁 765-820。

⁹ 秦賢次 (1995a)；秦賢次 (1995b)，頁 5-9。

¹⁰ 滿洲國爲傀儡政權已是衆所周知之事，1932 年 3 月成立，以後行文不再加「」。

¹¹ 許雪姬 (2003)。

¹² 許雪姬 (2004)，頁 1-75。

¹³ 許雪姬 (2007)，頁 57-117。

本文最主要是研究 1937 年日本占領北京後，台灣人在北京的活動。所使用的資料，是這時期住北京者的回憶錄或日記，如洪炎秋是自傳，¹⁴ 劉捷《我的懺悔錄》、¹⁵ 鍾理和的日記、¹⁶ 張深切的《里程碑》、¹⁷ 雕塑家楊英風自 1940 年到北京所寫的日記；¹⁸ 另在華北交通株式會社任職的楊基振也留下在北京的日記，¹⁹ 對瞭解他們戰前在北京的生活很有幫助。其次，日本駐中國各處的領事館（包括總領事館、領事館、分館、派出所）都會逐月（亦曾每季）向日本外務省報告在中華民國日本人的居住狀況（包括人數、職業），²⁰ 雖然資料並不完全，但筆者掌握了日本人在 1944 年 4 月所印製的最

¹⁴ 洪炎秋曾經在民國 55 年(1966)寫〈「又來廢話」代序〉，民國 56 年(1967)元月在《傳記文學》寫成〈「楊肇嘉回憶錄」序〉，這兩篇文章前面為他個人的自傳，其中有三分之一寫其在北京的大致情形；後者則大半介紹在北京的台灣人。見陳萬益編 (1996)，頁 2-17；頁 242-250。

¹⁵ 劉捷 (1998)，頁 94-98。

¹⁶ 鍾理和曾應林海音之邀而寫的〈我學習寫作的經過〉，及《鍾理和全集》共六冊，1997 年發行。第 6 冊中有上文（頁 219）及〈鍾理和生平與著作刊登年表〉（頁 225-233）。此外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於 1996 年出版《鍾理和日記》，頁 1-55，為鍾理和於 1945 年 9 月 9 日到 1946 年 1 月 16 日（並非逐日記載）所記的日記，由此可看見戰後在北平的台灣人及他們的遭遇。

¹⁷ 張深切的《里程碑》中，七十八、虎狼關起以至全書結束都在寫他在北京的遭遇以及在北京的台灣人。見陳芳明等編 (1998)，頁 629-753。

¹⁸ 楊英風於 1940 年到北京，其間除 1944 年短暫就讀於上野東京美術學校建築科外，都在北京。原就讀於北京日本中學校，他以一個青年的眼光記錄他所受的教育，尤其戰時中的各項活動、物價，他父親楊朝華所經營的新新戲院。1946 年回台。滯平期間亦寫日記，正如鍾理和和楊基振（下敘）的戰後日記一樣價值都相當高。謝謝楊英風先生長女公子楊漢珩尼師，慨然將其父日記影印本（戰前用日文、戰後用中文寫）惠贈，謹致謝意。

¹⁹ 楊基振（1911-1990），清水人，1934 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而後入大連滿鐵本社鐵道部服務，1938 年轉入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天津鐵路局貨物科長，後陞運賃係（運費組）主任，1940 年到北京本社服務，1942 年升到管事，運輸局賃率主任，1945 年 5 月辭職，而入啓新セメント（水泥）唐山工廠任副廠長，1946 年 5 月回台。他也留下戰前、後的日記，由 1944 年 10 月開始，他的日記亦相當貴重。見黃英哲、許雪姬 (2003)，頁 192-200。

²⁰ 有關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在外帝國公館ノ所在位置並在留民分佈狀態其他ニ關スル調査〉，可看到昭和 6 年(1931)到昭和 19 年(1944)間日本各地領事館所調查的日本人（包括朝鮮人、台灣人）、及在該領事館轄區內的外國人資料。到滿洲國建立之後就改為〈滿洲國及中華民國在台邦人口統計表〉，等到中華民國遷到重慶後又改成〈中國並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事實上有關滿洲的人口已由滿洲國自行印製，等到汪

後一次統計，知道當時在北京的台灣人有 548 人。²¹ 第三，旅券資料，日治時期台灣人到中國必須申請所謂的「旅券」，這些資料大半被保存下來，不過使用起來有些困難，²² 而且 1939 年以後到北京的台人顯著減少。第四，由台灣目前看得見的人士鑑、名人傳等一一尋找北京的台灣人蹤跡，並對有北京經驗的台人做訪談，亦為搜集資料的方法，如郭清海、林恩威的訪談記錄，因而能建立初步的名單，第五，學者對有北京經驗者的個人，如江文也、²³ 郭柏川、²⁴ 張秋海²⁵ 等人的研究，對本文的完成幫助更大。

本文擬先由大背景一日治時期台灣人在中國的活動開始探討，其次談 1937 年以前在北京的台灣人，第三，探討何以在這之前北京不到 60 個台灣人，卻在短短幾年間多了四倍，戰時的北京對台灣人而言有什麼吸引力？最後再談戰爭中在北京的台灣人如何生活，及幾個戰後面對漢奸、戰犯審判的人。希望由於研究者的投入，能早日瞭解日治時期台灣人所有的海外活動。

2. 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的活動

1895 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日本政府雖給台灣人自由選擇國籍二年（1897 年 5 月 8 日為台灣住民去就決定日），但最後選擇清國國籍（當時清

精衛在 1941 年還都前後，又改成《中華民國在留本邦人人口概計表》，分為北支、中支、南支三部份加以統計，而其主事機構也由外交部亞細亞第二局改為外務省東亞局第三課，最後改為大東亞省總務局調查課。但主要資料仍由在外領事館及相關警察合作完成。

²¹ K,3,7,0,9,中國並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關係一件，第 19 冊，昭和 19 年（1944）4 月 1 日，〈中華民國在留本邦人及第三國人人口概計表〉，大東亞省總務局調查課編製，昭和 19 年（1944）4 月，〈領事館管內別在留本邦人人口〉，北京為 548 人，之前為 560 人。

²² 由於赴北京需有渡華旅券，但自 1908 年後台人赴日已不需要「內地渡航証」，若自日本或中國其他城市前往，在旅券資料上顯示不出來，這是旅券資料不足之處。有關台灣的旅券資料自明治 30 年（1897）4 月起迄昭和 16（1941）年止，卷帙浩繁。

²³ 有關江文也的研究已經很多，如 1999 年出版《江文也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如較早期韓國鎭和林衡哲等於 1984 年出版的《音樂大師江文也》，敦禮出版社；1992 年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等出版的《民族音樂研究》第三輯《江文也研討會論文集》，或 2002 年張己任的《江文也：荊棘中的孤挺花》，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²⁴ 王家誠（1998）；據謝里法〈故土的呼喚—記臥病北平台灣鄉土音樂家江文也〉，說郭柏川妻朱婉華（1981）曾寫了一本回憶錄《郭柏川與我》。

²⁵ 周文主編（2000）。

朝尚未有國籍法)離開台灣的畢竟有限。²⁶ 台灣人雖然國籍更換,但仍必須到中國大陸去貿易、探親、進香、掃墓,由 1897 年 4 月起申請赴廈門的旅券資料,²⁷ 可以看出其赴中國大陸的理由以探親、就業的為多。這其中又以澎湖人的比例為高,因為澎湖距中國大陸比台灣近,雖然在行政區劃上屬台灣,並由台灣供給米,但日常生活所須大半取給於閩南,特別是廈門,因此赴廈門做生意,或在商船(戎克船)被雇為水手的不少。隨著日本在台灣的統治日趨穩定,並且立法禁止清國籍者擁有在台灣的土地所有權,以及日本刻意遮斷閩、台間的關係,並利用日本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讓台灣人稍微分享帝國的「恩惠」後,「台灣籍民」在中國形成特權,這之後前往中國大陸的目的,就不僅是如上所述的理由。

1898 年 5 月日本強迫清廷發佈福建省永不割讓的宣言,使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接著 1905 年日俄戰爭日本戰勝後,自東北、東南對中國展開鉗型的侵略,台灣總督府更有意取得侵略福建的主導權,雖然沒能成功,²⁸ 但台灣人隨著日本人陸續前往中國大陸各地,其人數有逐漸增加之勢。大抵來說日本對其僑民保護甚力,有急難時則利用鐵路、戰艦來撤退僑民,但因僑民分佈各處,要一一照應有其困難,僑民為了安全起見也都以住在都市為主,如 1928 年初因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在濟南時,日本槍殺負責協調的蔡公時,引起中國人的憤恨,在中國的日本僑民自是處在被報復的危險狀態中。這時日本外務省命令在中國各地的領事館調查當地僑民數(包括朝鮮人、台灣人)並事先策劃一旦有事如何集合、如何撤退,該地是否有軍艦可

²⁶ 據楊永彬的研究指出,在此際約有十萬人離開(包括非台籍的官吏及士兵),其後有五萬人再回台定居,三萬人則因中國動亂及台灣總督府的優待政策而回台,其中離開台灣不再回台的有二萬人。而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則稱台北縣有一千五百七十四人,台中縣有三百零一人,台南縣有四千五百人,澎湖有八十一人,共六千四百五十六人,離開台灣。見楊永彬(1996),頁 71-74。

²⁷ 日本外交史料館目前所藏最早有關台灣的旅券資料,分在三門八類五項八號,自明治 30 年(1897)4 月到 31(1898)年 6 月,如果由微卷的編號來看自 1401-1421,當時的旅券有下付和返納兩個時間表,申請時必須寫明姓名、地址(如寄留則需加上寄留住址),年齡、目的地、從事的工作、(有些地區還寫有身上的特徵);至於後來的「續柄」欄(即寫戶主,或戶主的長男,次女等家族關係)則都寫成「新臣民」。

²⁸ 同註 4,鍾淑敏(1999),頁 695-733。

以保護撤僑等等相關訊息。當時駐廈門領事坂本龍起、福州總領事西澤義徵，都做好妥善的準備。²⁹

至於當時的北京，雖因北伐後中國定都南京，但日本在「支那」特命全權公使芳澤謙吉仍駐在北京，當時在北京城內居住的日本人有 1,455 人（男 776、女 679），北京城內外則有朝鮮人 523 人（男 445 人、女 78），台灣籍民 82 人（男 71、女 11），朝、台人和日本人根本不住在一起，不過芳澤的報告中指出，除了一、二個例外，朝、台人在保護上沒有問題。³⁰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軍佔領瀋陽後，逐漸控制東北，在戰爭中日本原有撤僑的打算，後因日本掌握絕對的優勢，因此沒有行動，當時在東北的台灣人大概以就讀滿洲醫科大學者為多，數目有限。六年後盧溝橋事件，乃至上海淞滬之役發生，福州、廈門一帶的台灣籍民，也和日本居留民一樣，先被軍艦撤回台灣，³¹ 等到日本在戰爭中占優勢後，撤回的台灣人又陸續回到原地，當時共撤退 700 多人。³²

隨著日本在中國無限制的擴張，在人力的需求倍增，故在台募軍屬、軍夫以投入中國戰場之事屢見不鮮，甚至以農業義勇團身份到上海江灣一帶種菜的台人也有；³³ 而日本採以漢制漢的方式在各地成立偽政權，再加上日本為控制中國而在各地設的特務機關，更需要人手，部份台灣人也就因此在各偽政權、³⁴ 特務機關中擔任職務。目前所知幾個高職位的台人，如任職「滿洲國」外交部總長（帝制後改稱大臣）、駐日大使的台灣新竹人謝介石、汪精衛政權參贊中將兼僑務委員藍家精，至於中低級的公務人員則更多。有這些成功的先例，使台人更安心前往中國。

²⁹ K,3,3,0,6-1,在外帝國公館ノ所在位置並在留民分布狀態其他ニ關スル調査，中國ノ部（滿蒙ヲ除外），機密第 65 號，昭和 3 年（1928）2 月 21 日，在福州總領事西澤義徵致外務大臣男爵田中義一殿，〈在支各公館ノ所在位置並在留民分佈狀態其他ニ關シ報告ノ件〉。

³⁰ 同上，機密第 486 號，昭和 3 年（1928）4 月 21 日，在支那特命全權公使芳澤謙吉致外務大臣田中義一，〈在北京公館ノ所在地滞在留民分布狀態其他ニ關シ報告ノ件〉。

³¹ 陳漢光訪問（1991），頁 247。

³² 竹內清（1940），頁 83。

³³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記錄（1994），頁 87-89。

³⁴ 指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汪記中華民國政府（汪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此外為滿州國、蒙古聯合自治政府。

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同工不同酬，如同是台北工業學校畢業，進入台電，每日的薪資和里程津貼，日人就比台人高；³⁵ 同樣當訓導，日本教師多六成薪水。除了這些差別待遇外，同樣是大學畢業，但台灣人常找不到工作，甚至是用非所長。如同樣是台南工學校畢業，日本學生都找到公家單位就職，幾個台灣學生卻無處可就職，其中的楊藏嶽乃選擇到滿洲就職。³⁶ 京都帝國大學工科畢業的朱江淮，雖進入台電工作，但並不能發揮專長而只在推銷用電部門任職。³⁷ 因此台人在台工作機會少，往海外，尤其是中國大陸，就成爲當時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除了上述情勢外，台灣人赴海外也有其優勢，如果到福建廈門、廣東汕頭、廣州一帶，沒有語言的障礙，因此前往者最多；其次到各大商埠如上海、天津、大連，甚至北京、南京，也因具有雙語的能力，而能扮演著日、中兩國人的橋樑位置；當然不會北京語的，只要進入日本人的統治體系、日本人的機構，也不成問題。

前往中國有幸與不幸，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卻也喪生異域；在政治上，如果一開始就立場堅定地與國民政府體系連繫，進入國民黨黨部或相關部門工作，則不但不必承擔任何戰後台人共同面對漢奸、戰犯審判的壓力，且成爲國民黨政府表彰忠心、酬庸的對象，甚至成爲接收大員，分享戰爭「勝利」的成果。在重慶的台灣人並非各個是當時台灣的第一流人材，只因因緣際會，就成爲和外省官僚「共治」台灣的半山集團，有關這部份早有研究不贅。本文主要針對國民政府所謂「淪陷地區」—北京的台灣人加以探討。

3. 1937-1945 年的北京

(1) 北京的軍、政組織

最早定都於北京的是金朝的海陵王完顏亮，³⁸ 而後是元朝的忽必烈，稱大都。明初雖定鼎南京，但明成祖改定都北京，歷經清朝迄民國初年，北京

³⁵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記錄 (1994)，頁 348。同樣畢業於台北工業學校，進電力公司當工手，日人一天一圓五十錢，而台人只有一圓十五錢，里程津貼日人一公里八角，台人七角。

³⁶ 楊藏嶽畢業於台南工業學校化學科，日本同學在畢業前已找到工作，只有兩個台灣人沒有工作，只好到福岡參加到滿洲國就職的考試。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 (2004)，頁 440。

³⁷ 林蘭芳 (2003)，頁 416-417。

³⁸ 竹內實 (1999)，頁 126-127。

都是中國的首都。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遂改為北平特別市，1930年改為北平，隸河北省。1937年10月日本占領北平後，又將之改為北京。³⁹

早在七七事變以前，日本已蠻橫地要中國確認其在華北的特殊地位，7月7日以後，日本武官今井武夫少將向北平市長秦德純提出中國軍隊完全撤出宛平的要求，不果。28日日軍對南苑、宛平發動全面攻擊，是晚二十九軍撤離北平，7月30日天津也被日軍攻陷，平津地區落入日軍的掌握中。此後日本政府展開扶植親日人士出面組織維持會，先是7月底以江朝宗為首建立北平地方維持會，⁴⁰8月1日天津治安維持會在高凌霨會長的主持下成立，到12月13日，中華民國政府撤出南京後，王克敏乃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南京則由沈能毅組成「華中中央政府準備委員會」。1939年9月1日蒙古聯合政府成立。翌年3月30日汪記「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宣稱還都。⁴¹

汪記中華民國政府建立後，表面上似乎將分立各地的傀儡組織統合起來，⁴²事實上並不盡然。以北京為例，1937年12月14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於中南海，設華北行政委員會（包括議政、行政、司法三委員會），由王克敏任委員長，其統轄的地區包括華北四省（河北、河南、山西、山東）、三市（北平、天津、青島），汪記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後，北平名義上屬於汪記政權，改稱華北政務委員會，實際上仍在日本華北方面軍控制之下。⁴³

³⁹ 有關北平何時被日本人改稱北京有不同的說法，《北京史稿》說是1937年10月改北平為北京，建立偽北京特別市政府；甄國憲編（1994），頁234；《北京史》說是1938年4月17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布改北平為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史》編寫組（1999），頁437，應以前者為是。

⁴⁰ 江朝宗何時成立治安維持會的時間亦人言言殊，《北京通史》說是8月1日，而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的資料卻說是8月2日。前者見曹子西（1994），頁80；後者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1981），頁255。

⁴¹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1981），頁256-257。

⁴² 儘管1940年1月23日以汪精衛為首，在青島召集王克敏、梁鴻志共三人的「青島會議」決定取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及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事實上仍未達到統合的目的。主要是軍方想要將華北切離，使之和滿洲國一樣將之殖民地化所造成的結果。見清水晶（1995），頁62。

⁴³ 北京大學歷史系（1999），頁437。

華北政務委員會下分內政、治安、法治、賑濟、教育、建設、財政等總署（原稱部），總長改爲督辦，底下分省、道、縣三級地方行政，北京市郊屬於河北燕京道管轄。

前已說及平津地區受日本華北方面軍控制，華北方面軍如何組成？1937年8月31日日本將投入華北的部隊編爲華北方面軍，司令部設在天津，翌年遷至北京，司令官爲寺內壽一大將，其下轄兩軍，第一軍由第六、第十四、第二十師團爲骨幹編成，第二軍以第十、第十六、第一〇八師團爲骨幹編成，加上直轄的第五、第一〇九師團共八個師團，兵力37萬餘人，而後增至44萬人。華北方面軍復設立以喜多誠一少將爲首的特務部，用來扶植、管轄華北政務委員會。1939年10月日軍以齊燮元爲司令，設了治安軍。⁴⁴

除上述軍政組織外，日本特務部還組織新民會，該會有稱之爲「奴化教育」團體，也有認爲是無所不入、無所不包的龐雜而反動的組織，成立於「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建立之日，翌年成立首都指揮部，「日本統治者利用新民會組織監視和控制日僞統下人們的思想、言論和行動，包攬了基層政權工作，以及諸如武裝、經濟方面的工作，向人們灌輸中日親善、共存共榮，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侵略者的幫兇。」⁴⁵爲了培養人才，新民會設立新民學院培訓各級人士，如中學校長等。

(2) 教育機構

當七七事變發生後日軍進逼平津時，北京大學教授聯合發表〈對盧溝橋事變之宣言〉，指出爲人道正義、爲自由、爲和平而犧牲，在所不惜。⁴⁶日軍進入北京後，北京、天津的一流大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成西南聯合大學，遷到湖南長沙，10月25日開學，1938年再遷至昆明；⁴⁷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遷至西安，合組西安臨時大學，於11月開學，翌年4月3日改名爲國立西北聯合大學，8月再

⁴⁴ 同註 39，甄國憲編（1994），頁 234-235。

⁴⁵ 同註 39，甄國憲編（1994），頁 249-250。

⁴⁶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1997），頁 187。

⁴⁷ 同註 46，頁 206。

改名為國立西北大學。⁴⁸ 大批教授、學生因而南下，也有部份革命學生未離開而從事抗日事業。⁴⁹ 也有教師如洪炎秋奉北平大學之命留在北平，擔任農學院的保管委員。⁵⁰ 以下以「北京大學」為例做一說明。

日本佔領北京後，先是由王克敏等籌組華北政務委員會，下設教育總署，任湯爾和為督辦，將北京大學和北平大學合為「國立北京大學」，於 1938 年 8 月開學，由錢稻孫⁵¹ 任校長，周作人任文學院長，俞平伯等人亦留校任教，文學院因為沙灘紅樓為日本憲兵隊⁵² 所占，乃在馬神廟北大圖書館邊新蓋三層大樓一座使用；而理學院則仍設於景山東街前北京大學理學院原址。1939 年由周作人擔任教育總署督辦（以今天來說就是教育部長），因此戰後成為二等漢奸，但因護校有功，只被判刑十年。⁵³ 儘管這是一所國民政府認為的偽學校，但對於未能逃往後方的學齡青年，仍不失為一所好的大學，台灣青年亦有人前往就讀。只是畢業於「北京大學」的偽學生，戰後必須被「甄審」合格後才算學歷。⁵⁴

(3) 經濟

在日本占領下，華北一帶公私營企業都被日軍接管，在輕重工業方面鐵、煤、電力、紡織等企業都交由滿鐵在北京設立的分公司—興中公司接管；1938 年 4 月日本在北京成立華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並相繼成立華北交通、汽車、發電、鹽業等一系列子公司，來掌控華北經濟的命脈。在貨幣方面，

⁴⁸ 同註 46，頁 2-3。

⁴⁹ 同註 39，北京大學歷史系 (1999)，頁 439。

⁵⁰ 洪炎秋 (1996)，頁 88。

⁵¹ 浙江吳興人，1887 年生，義大利羅馬大學畢業，1927 年任國立清華大學講師；1931 年任同校外語系、歷史系教授，兼任圖書館館長。1939 年「北大」開校，除任北大秘書長外，也兼任北京師範學院圖書館主任及文科主任兼教授，由於其中學在日本受教育，故翻譯不少日本文、史學名著。見橋川時雄 (1940)，頁 735-736；洪炎秋則稱錢是「北京大學」校長。

⁵² 除了華北方面軍外，在北京日本設有日本警備隊、憲兵隊本部、警察總署、陸軍特務機關、興亞院華北聯絡部、北支事情調查處等機構。見註 39，甄國憲編 (1994)，頁 235。

⁵³ 同註 50，頁 88-89，當周在戰後被以漢奸罪名逮捕，受審時供稱留在北平是受北大校長蔣夢麟託他留京照顧學校，蔣亦去函法院證實，又有新任校長胡適替他証明保全北大有功，法院只判其十年，在中共進北京前被釋放。

⁵⁴ 羅久蓉 (1993)，頁 205-231。

日本發行「聯銀券」做爲唯一通貨，並納入日元體系，與台幣（台灣銀行發行）比爲一比一；⁵⁵ 爲了應付戰爭，日本設立華北墾業公司，栽種棉花、糧食作物，類似的農場到 1942 年下半年共有五十五處，霸占土地近七萬畝，大半糧食都運往日本、滿洲，當地只保留百分之 35.7%。太平洋戰爭以後，開始實行配給制度，不僅有日、中的差別待遇，配給量也隨戰爭的日益擴大而配給愈少，人民生活困苦。

到戰爭後期，物資缺乏，卻由新民會發起捐獻飛機運動，勸募、攤派、獻納，強制回收金屬品等，在北京實施戰時經濟體制，⁵⁶ 一如日本在台灣所爲。

日本人雖藉由軍、政、經濟、教育對佔領區加以控制，但所謂佔領區僅是點的大城市及其近郊，並確保點和點線間的交通順暢而已，離北京城郊外即有不少抗日的國共雙方的武裝基地，進行獨立的游擊戰爭，不時出擾，使日方不得不強化治安，⁵⁷ 故日軍只能維護北京等大都市及其郊區的治安。

北京雖然在日本占領下，但政治中心、文化古城的昔日形像仍然存在，猶有一份止不住的魅力吸引各方人士前往北京。

4. 在北京的台灣人 1937-1945

(1) 1937 年以前在北京的台灣人

1931 年據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估計，當時在中國（包括關東州、滿州、中國本部、香港、澳門）的日本人共有 935,630 人，以在滿洲的朝鮮人 629,235 人爲最多。當時關東州沒有台灣人旅居，在關東州之外的東北地區有 35 人，在中國本部有 12,240 人，在香港有 48 人，共 13,070 人。⁵⁸ 依第五表〈支那

⁵⁵ 原先發行一千四百萬元，但遭商民抵制，以後規定除中國、交通兩銀行紙幣可用外，禁止其他紙幣通行，到 1939 年底就只剩聯銀券，見註 40，曹子西（1994），頁 88。

⁵⁶ 同註 55，頁 102-103。

⁵⁷ 同註 39，甄國憲編（1994），頁 234-235。

⁵⁸ K,3,7,0,9,〈中國並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關係一件〉（昭和 6 年度），昭和 6 年（1931）12 月末日〈支那在留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第二十四回〉，第二表〈關東州並滿洲在留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

本部並香港澳門在留本邦人外國人及中國人人口統計表〉，當時台灣人在北平有 51 人（男 36，女 15），天津有 18 人（男 11，女 7），如果將平津人數合起來看，1927 年有 112 人，1928 年有 123 人，1929 年有 99 人；1930 年有 62 人，1931 年 69 人。如果和當時其他都市相比，大概排名第五，次於廈門（包括鼓浪嶼）共 7,957 人；福州（還包括閩侯、長樂、南平縣）共 1,235 人；上海（還包括寧波）共 439 人，汕頭（還包括澄海、潮安、梅縣、潮陽、嘉應州、詔安）共 406 人。北平是第五位，以下則是廣東（還包括海口）共 65 人，香港 48 人，南京 35 人，蘇州 11 人，青島 6 人，杭州 3 人，九江 2 人，漢口 1 人，長沙 1 人。濟南在 1927 年時有 3 人，翌年之後就沒有人。⁵⁹ 由上可見北京算是台灣人較多的地方，職業則以求學為多。

1932 年 12 月時北平的台人有 56 人，⁶⁰ 1933 年 12 月，有 48 人，⁶¹ 1934 年 12 月，有 58 人。⁶² 1936 年有 59 人，⁶³ 據 1937 年即七七事變這一年的統計，北平的台灣人全數離開。⁶⁴ 由上可知在七七事變以前在北京的台人最多不超過 60 人。

(2) 1938 年以後的台灣人

局勢稍穩定後，1937 年底北京有 31 人，同年底，大連有 113 人，南京有 6 個台人。⁶⁵ 1938 年 1 月以降，據日本政府調查在北京的日本人有 5,828

⁵⁹ 同註 58，第五表〈支那本部並香港、澳門在留本邦人外國人及中國人口統計表〉

⁶⁰ K,3,7,0,9,〈中國及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關係一件〉昭和八年度（1933），〈五、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在留本邦人人口統計表〉

⁶¹ K,3,7,0,9,〈中國及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關係一件〉昭和九年度（1934），〈五、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在留本邦人人口統計表〉

⁶² K,3,7,0,9,〈中國並ニ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關係一件〉昭和 11 年度（1936），第 1 卷，〈昭和 11 年 10 月 1 日現在〉〈滿洲國及中華民國在留本邦人人口概計表〉。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在留本邦人人口概計表，此年度以後採中支、北支、南支分類。

⁶³ K,3,7,0,9,〈中國並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關係一件〉，昭和 12 年（1937）1 月-12 月，〈七、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在留本邦人人口概計表〉，當時天津還有 76 人，灤縣 2 人，山海關 5 人，上海 12 人。

⁶⁴ K,3,7,0,9,〈中國並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關係一件〉，昭和 13 年（1938）1 月，〈北京日本人許可營業調查表〉。

⁶⁵ 同註 64，昭和 13 年（1938）8 月 26 日，在北京帝國總領事館，致外務省東亞局第二課，本部囑託課。

人，其職業分析中，只有看板業有一個台灣人，在文後加一句：「台灣人不多，但全部從事正當行業，近年不少到新政府任官的」。此新政府指的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自 1938 年 3 月起在北京的台人逐漸增多，六月有台人 42 人，7 月末為 140 人，（其中壯年男子 72 人，男孩 16 人，壯年女性 29 人，女孩 23 人），8 月末為 142 人，12 月有 164 人；⁶⁶ 到 1939 年初，北京有台人 161 人，⁶⁷ 7 月北京的台灣人已突破 200 人，為 208 人，其人口結構為 92 戶，成年男性 117 人，男孩 27 人，女性 62 人，女孩 22 人。⁶⁸ 1940 年 2 月，北京的台人降為 194 人，⁶⁹ 但到 4 月，則又增到 277 人。若加再上南口 1 人，長辛店 1 人，保定 3 人，則為 285 人。⁷⁰ 8 月台人突破 400 人為 406 人，⁷¹ 若細加分析各區的台人可得如下：

北京區	戶	男人	男童	女人	女童	共計
內一區	44	57	18	15	7	97
二	27	44	4	4	0	52
三	9	12	4	1	2	19
四	8	8	3	7	8	26
五	9	13	6	6	1	16
六	13	18	1	10	5	34

⁶⁶ 同註 64，昭和 14 年（1939）7 月 1 日現在，《中華民國在留本邦人人口概計表》，東亞第三課編，〈二、領事管內別在留本邦人人口〉。

⁶⁷ 同註 64，昭和 14 年（1939）7 月 1 日現在，《中華民國在留本邦人人口概計表》，東亞第三課編，〈二、領事管內別在留本邦人人口〉。

⁶⁸ 同註 64，第 818 號，昭和 14 年（1939）7 月 15 日，在中華民國（北京）大使館參事官堀內干城，〈北支在留邦人戶口統計報告ノ件〉，北支警務部，昭和 14 年（1939）5 月來現在。

⁶⁹ 同註 64，中國並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關係一件，昭和 15 年（1940）1 月 1 日-5 月 21 日，277 號，昭和 15 年（1940）3 月 18 日，在中華民國（北京）大使館參事官藤井啓之助，〈北支在留本邦人人口概計報告ノ件〉。

⁷⁰ 同註 64，昭和 15 年（1940）4 月 1 日，〈在支本邦人人口統計表〉。

⁷¹ 同註 64，昭和 15 年（1940）8 月 16 日，在北京總領事上田豐，致外務大臣松岡洋右，〈中華民國在留本邦人人口概算報告方ニ關スル件〉

外一區	1	1	0	1	1	3	
二	39	50	23	12	12	97	
三	5	6	3	4	1	14	
四	2	4	0	3	0	7	
五	3	5	1	3	2	11	合計 386
南口南口	1					1	
昌平縣城	1					1	
長新店	1					1	
保定	1	3	1	2	1	7	
石家莊	1	5	0	1	2	8	合計 18 ⁷²

1941年10月，已增到532人（4月462人，7月490人）。⁷³ 1944年4月最後一個數據是548人，⁷⁴ 而當時在華北（北支）的台人共1,472人，亦即有三分之一強的台人集中在北京。第二位的是天津530人，青島190人，太原39人，張家口、大同各24人，開封21人，塘沽14人，唐山13人，芝罘7人，厚和、張店各5人，包頭1人。⁷⁵ 如果以華北、華中、華南台人的人數來相比，華北1,472人，華中7,276人，⁷⁶ 華南41,712人，⁷⁷ 華北的台人數目較少。

⁷² 同註64，第八一六號，昭和15年（1940）8月15日，在中華民國（北京）大使館參事官藤井啓之助，致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北支在留邦人人口統計表報告ノ件〉，北京日本大使館警務部。

⁷³ 同註64，第一七〇號，昭和16年（1941）2月25日，在北京總領事北澤直吉致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殿，〈中華民國在留本邦人人口概算報告方ニ關スル件〉。

⁷⁴ 同註64，昭和19年（1941）第二報（4月1日），中華民國在留本邦人及第三國人人人口概計表，大東亞總務局調查課，2、領事館管內別在留本邦人口，昭和19年（1941）4月。

⁷⁵ 同註64。

⁷⁶ 華中的台人，以上海3,847人為最多，其次是杭州3,612人，尤其是杭州，1944年初才有677人，不到三個月內約增加3,000人，原因不明，第三是南京1,448人。以下漢口有488人，蕪湖有382人，蘇州有200人，蚌埠115人，九江112人，徐州32人，海州5人。

⁷⁷ 華南以廈門掛帥8,596人，其次是海口市8,047人，廣東3,892人，汕頭1,774人，澳門有106人。

(3) 台人赴北京的原因

台灣人到中國大陸的原因不外是在台灣就職難；不願受日本人的差別待遇；中國各類大學很多，易於升學，且學費低廉，得以接受高等教育。這當中台灣人原鄉的廈門、汕頭等華南地區前往的人最多，可以瞭解；何以北京是到華北的台人最嚮往的地方呢。

第一個原因為北京是數百年來的帝都，正如第一次到北平的 Heinrich Schnee (1891-1949)，他是李頓調查團中的德國代表，到北京看到其庭園、宮殿、寺院後，感謂中國文化是如何在偉大之發展道上前進。而幾世紀以來所構建的帝都，呈現出中國在各方面的業績而集其大成，人只要到了北京就可以完全地理解上述的感想。⁷⁸ 台灣人的祖先身炙漢文化，對文化中國有一份強烈的認同感，尤其處在大和文化日本人的統治下，孺慕之情更深，而北京帝都文化的豐富性，是藝術創造的絕佳之地，江文也到北京也正是在這背景之下。

其次北京當時在日本的佔領之下，台灣人是日本籍，在佔領區內幾可享受和日本內地人同樣的待遇，物質生活無虞缺乏，⁷⁹ 安全得到保障；更因日本強佔中國廣大地區，日本人有限，台灣人又往往具雙語能力（或者很快習得北京話），故成為日本佔領體系下的中下層官僚。洪炎秋在戰後的回憶也論到當時台灣人到了北京相當容易可以謀到一官半職：

在敵偽佔據時期，台灣人有些本領的如肯接受利用，要做個相當的官，十分容易。因為在大陸待過的台灣人，大概都通曉中日兩種語文，不僅懂得這兩國的人情風俗，比漢奸腿子，日本鬼子和高麗棒子，都好用得多，所以在外交方面出過駐偽滿的大使和駐日本的偽總領事，在內政方面出過偽省長、偽道尹和好些偽縣長、偽局長之類；軍事方面出過偽綏靖主任、偽師長、偽副官、偽軍校教官。至於秘書、科長，

⁷⁸ ハイリッセ・ジュネー (Heinrich Schnee) 著、今森誠也譯 (2003)，頁 95-96。

⁷⁹ 林更味女士在接受訪談時即說明台人與日人都有配給，即使到日本投降時，一家子的配給還多給一個月。《日治時期在「滿州」的台灣人》，頁 373。楊英風在民國 34 年（1945）8 月 15 日記中也寫道：「日本の配給は我々にまで 9 月分を呉れた」。

更是不計其數。⁸⁰

台人到北京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受到台灣同鄉或日本人的援引。以江文也為例，他在日本也未必能謀得好職業，因而得到當時任北京師範學校校長同鄉柯政和之邀到北京任作曲教授。⁸¹又如原任國立新京工礦技術學院（後改名新京工科學）⁸² 教授的林朝榮，1940 年辭職，到「北京大學」任教，他勸告在滿洲國外交部權運署工作的同鄉張世城，一起遷到北京居住，至少北京比「新京」（長春）暖和。張世城到北京後，得到原來日本上司的引荐，到日本華北電影公司就職。⁸³

戰時中，據 1939 年到中國的奧國新聞特派員 Colin Roß（1885-1945）在北京的觀察，他說北京那樣擁有百萬人的都市卻只有幾千個日本駐屯軍駐防，即可自由到一般市街地區去，那是因為固然有一部分中國人敵視日本人，但也有不少中國人並不敵視。他們不信用蔣介石，但他們也不願受歐美的支配、影響，並有與其受歐美人不如受日本人統治的想法。當然日本軍在中國占領區內，實施恐怖政治，但他說至少在華北並未如此。不僅北京，在其他小城市日本人都可和中國人一起生活、互相學習語言，日本人用了很大、很巧妙的手段以求得中國人的同感，日本人不想要將中國人日本化，而是要使中國人回復其儒教的生活源泉。他認為要中國人對日本人逐漸接納，一則要時間，一則要不屈不撓地將建設東亞新秩序形成一種意識形態。他認為和三十年前的朝鮮和五年前的「滿洲國」比較，當地人對在該地住的日本人，在感情方面已有很大的改善，不過這些在華北做可能容易些，在華中、華南則有困難，因該地接近中國國民抵抗的中心地（指南京），而日本軍在 1937 年有南京大屠殺一事。⁸⁴

⁸⁰ 同註 50，頁 97。

⁸¹ 吳玲宜 (1992)，頁 161。

⁸²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1946 號，康德 7 年(1940) 10 月 21 日，頁 408；許雪姬訪問、王美雪記錄 (2004)，頁 368。

⁸³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記錄 (2004)，頁 369。

⁸⁴ Colin Roß 著、金森誠也譯 (2003)，頁 193。

但他同時也指出，日本人能在中國立足，主要是確保經由鐵路的交通線，因此日本的中國侵略史可說是一部鐵道確保的歷史。在日本廣大的佔領區內，也只有鐵道能及的地方才在日本人統治之下，北京附近只要超過安全地帶就不會安全，如附近的西山最好別去，明十三陵也在禁止參觀之列。⁸⁵ Colin 的看法是完全站在侵略者日本的立場發言。

如果就北京當地居民的感受就不是如此了。且看一位北平人的證言：

日軍在淪陷區實行血腥的高壓政策，市民沒有言論、結社自由，整日提心吊膽，總怕橫禍飛來，大家緊閉門戶，蜷縮在家裏，北平變成一座死城，一座人間地獄。……1943 年春……北平物價一日三漲，市民得起早排長隊購買難以下嚥的混合麵以糊口，街面乞丐成群，在街上走不多遠，就能看見一具倒臥死屍；市面蕭條，但大煙（白麵、毒品）館、妓院林立。淪陷區的百姓煎熬在水深火熱之中。⁸⁶

北京更成爲日軍、國民黨、共產黨角力的場所，這在所謂淪陷區可說是每天上演的事。國民政府爲了制裁與日人合作的漢奸，不時使出暗殺的手段，在北京周作人也曾被暗殺過，據洪炎秋認爲，此後他自暴自棄就接受「僞華北教育總署督辦的職務」。⁸⁷ 不過在戰爭中的北京，一般來說比起中國其他淪陷區來得穩定。

台灣人被故都的魅力吸引，又能在北京求職，享受和日本人一樣的待遇；且有師友、親朋的援引，故前往北京。

5. 戰時中在北京的台灣人之生活

如上述，據官方統計，戰時中在北京的台灣人有 540 多人，但這只包括有到領事館報到的台人，雖然不盡正確；不過因這與戰時配給密切相關，因

⁸⁵ 同註 84，頁 186-190。

⁸⁶ 文英 (1998)，頁 595。

⁸⁶ 同註 86，頁 186-190。

⁸⁷ 同註 50，頁 97。

此這個數字也相對正確。⁸⁸ 500 多人中，眷屬大概要占到三分之一；就目前手中的資料要一一列名有其困難性，主要是戰後國民政府雖只處分擔任偽職在縣長級以上者漢奸之罪，但在淪陷區的經歷畢竟在戰後現實的政治環境中沒有什麼好誇耀的，因此有些人隱匿了這段經歷，即使有自傳式的回憶錄，對提到的台人也大半隱名或點到為止，怕姓名曝光而影響到對方，這在張深切、劉捷、洪炎秋的书中都可見類似情形。這些書中的資料雖經比對，可以查出部份人名，但想要將戰爭中在北京的台灣人一一臚列，可說是緣木求魚。以下利用我目前所能找到的資料拼湊出一份個人的名單（參見〈1937-1945 在北京的台灣人〉）並予以簡單的分析，希望對了解當時台灣人在北京的活動有所幫助。

(1) 就職業方面來說

(a) 在北京的台灣人中以從事教職的為多，共有 15 位。

(i) 在北京大學任教者：洪炎秋、張我軍、蘇子蘅、林耀堂、黃春江。洪炎秋原在北平大學農學院教日文，日本占領後北京、北平大學兩校合併，於是順理成章續任，他個人也在北京師範大學兼任。張我軍 1929 年在北師大國文系畢業後，先後在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中國大學任日文講師，1937 年後即正式在北大文學院日本文學系、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文學系任教；蘇子蘅則自 1941 年在北大理學院任副教授，他親共，故以其教授身份掩護加入晉冀察城工部，將有意赴中共抗日基地者送往，台灣人呂芳魁、⁸⁹ 林思平即經此管道到中共抗日基地。林耀堂要到 1944 年才由滿洲國大陸科學院到北大藥學系任副教授。這四個人中只有蘇子蘅沒有回到台灣，戰後在

⁸⁸ 洪檣 (1946)，頁 2。有些是以中國人的身份滯京，有些是戰後向北平集結。

⁸⁹ 呂芳魁為滿洲建國大學學生，台北人，1942 年春，他和幾個左傾學生欲逃往共區被追回。1943 年冬，呂與其他同學被日軍強征入伍，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學習，他與另一台人同學游禎德（時在日本四國）潛回北京，在蘇子蘅的介紹下於 1945 年 6 月到中共晉冀察根據地。戰後他到張家口共軍炮兵團教導隊任教官，訓練反坦克技術人才，1946 年 2 月在帶學員做實驗時突然爆炸，呂當場死亡，時年才 26 歲。呂化名為李子秀，其殉難地中共為其立碑。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 (1998)，頁 575-578。

中國任大連大學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台盟總部主席、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顧問。⁹⁰ 黃春江任教於北京大學礦務系。

(ii) 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的有 6 人：師範大學原為學院。林朝權於 1940 年任體育系教授兼主任，華北體育協會常務理事。⁹¹ 其弟林朝榮 1942 年任地學系教授；另一位學哲學的洪耀勳也在 1937 年自台北帝大辭職前往；張秋海則在 1940 年任北師大的工藝專修科副教授；柯政和在 1923 年已在國立北平師範音樂科任教授，1940 年入北京師範學院任音樂系主任，因此邀江文也到校任教。柯政和後來在新民會擔任北京特別市總會事務局次長，及北京師範學院體育音樂科教授；⁹² 江文也則在 1945 年離職。

(iii) 在國立北京藝專任教的為張深切：1938 年任本校教授兼訓育主任，同時也在新民學院任日語教授，後因內部鬥爭而去職，回台十個月後再返北京，入新民印書館任編輯。

(iv) 在新民學院任教的有吳坤煌，兼課的有吳敦禮、張深切。新民學院，《北京通史》稱其為「培訓漢奸骨幹」的學校，由日本華北方面軍所設立，學生畢業後分配到華北各地日本樹立的政權中充任官吏。⁹³

(v) 在京華美術學校任教的郭柏川：1938 年到北京，並舉辦個人首展，以後每年展一次，直到回台，1942 年他應聘到本校任教。⁹⁴

(vi) 在中學教書的有兩位，一是劉捷，在吳坤煌介紹下於 1939 年到北京第四中學教日文；鄧火土則是北京日本中學校生物科老師。

(b) 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任職的有 6 位，一是吳敦禮（吳克竣），在國民政府時期已投入外交部工作，一度外放任中華民國

⁹⁰ 蘇子衡 (1998)，頁 585。

⁹¹ 不著編人 (1943)，頁 60。此書為筆者於 2004 年 8 月赴瀋陽，在圖書館中找到，原書已不全。謝謝在該館服務的吳利薇小姐的協助。

⁹² 同註 15，頁 98，言「最高幹部之一」；同註 91，頁 142。

⁹³ 同註 40，曹子西 (1994)，頁 89。

⁹⁴ 同註 24，一書言郭在京華美術學校任教，觀《華北政府職員錄》所載郭之履歷任教的為北京藝術專科學校，姑從前者。

駐巴拿馬公使館秘書兼領事事務代理總領事，後調回部。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任外務局日本科長、新民學院教授。汪精衛在南京建立政權後，因汪曾任外交部長，吳是其部下，乃擔任外交部參事兼中央宣傳講習所教授，後調駐菲律賓領事館任總領事，1941年10月被派到橫濱領事館任總領事，而後到北京大學擔任東亞外交史客座教授。⁹⁵ 李金鐘於1937年任統稅局阿片科科長，兩年後轉職到南京。楊克培則在1938年到河北定縣當縣長，劉捷曾到該地拜訪他，留下他的感慨「只想早年的左派思想鬥士亦被時代環境壓倒，當新政府的縣太爺，抽大煙，令人可嘆！」⁹⁶ 以後因不願替日人壓迫當地百姓而被撤職，之後隱居北平，沉淪於鴉片。謝廉清則任實業部商工科長，之後升畜產司長。⁹⁷ 王英石服務於電信局。林文龍，先任臨時政府實業部參事，再任情報局局長，也因之成為東亞文化協會評議員及華北作家協會評議員。劉心皇在撰寫《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時將林文龍視為落水作家，且排名第四，僅次於周作人、錢稻孫、俞平伯。

(c) 在北京警局工作過的有三個人：彭華英1939年自滿洲電報電話公司辭職而到北京市警察局任秘書、特務科科長、經濟科科長，1944年轉入華北廣播協會任廣播會長；辜炎瑞則1939年起一直在北京警察局外事科服務，並輾轉各區，1943年任外二區首席局員；劉捷1937年初到北京時也到警察局擔任電檢工作。

(d) 在軍方服務的有3人：黃南鵬任華北綏靖軍等二集團軍司令，戰後仍被蔣主席委任為北平憲警聯合會辦事處主任。張大模、黃天生則是軍屬，在北京飛機場工作，依洪炎秋所計，在北京另有軍屬95人。

(e) 從商者有8人：黃烈火和宋維屏在北京組織公司經商，張深切為顧問，但因為未和「敵偽的惡勢力勾結，不但無法賺錢，還要大受折磨，結果大虧老本，並且因為有接濟抗日份子的嫌疑，」⁹⁸ 張深切被日本特

⁹⁵ 許雪姬訪問、丘慧君紀錄 (1995)，頁183。

⁹⁶ 同註15，頁102。

⁹⁷ 劉心皇 (1980)，頁258。

⁹⁸ 同註50，頁95；頁106。

工組織一四二〇部隊拘捕，幸獲保釋，黃烈火也因此躲藏了好幾個月。吳子瑜、林子瑾（少英）都是台中櫟社成員，兩人係表親，到北京經商，但都未獲大利；周合源於 1938 年到北京，與人合作做煤礦生意，規模很小，僅做為流亡時糊口之用；鍾理和也曾一度開一家煤炭店，但為專心寫作而關店，由親戚接濟。楊朝華則從事戲院經營。

(f) 在事業機構任職者有 4 人：李增禮任華北開發公司副參事，邱鴻祥任燕京製紙株氏會社勞務課課長，鍾理和一度於 1941 年任華北經濟調查所翻譯員；張世城則為楊朝華所雇，而後轉任於日本人開的華北電影公司。楊基振於 1940 年到華北交通會社本社（北京）任職，1942 年升管事，1945 年辭職，轉任啓新水泥工場唐山廠的廠長。

(g) 學醫的有 5 人：顏春輝取得燕京大學醫學博士後在燕大教書十年，後任北京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主任、教授，戰後回台任台灣省衛生處處長；梁永祿於 1938 年到北京，先在北京大學附屬醫院當醫生，因被日本主任猜忌，乃辭職，⁹⁹ 開設三安醫院；黃樹奎原為滿洲國外交部總長、駐日大使謝介石的私人醫生，也是外交部的囑託醫，謝卸任後，黃乃遷到北京開業；林思平之所以到北京是因為要透過關係到中共抗日基地晉察冀解放區，1945 年春天即離開；之前他在太原醫院工作，因奔喪回台再到北京。林茂生，畢業於日本名古屋醫科大學，1939 年任青島鐵路醫院醫員，1940 任北京鐵路醫院院長，長辛店分院長兼醫長。¹⁰⁰

(h) 至於在北京的學生，就讀北京大學的有政治系的李崇仁、洪伯仁，機械系的林東波，應用化學系林恩威，法律系張錦水；就讀北京師範大學的有英語系林華輝，北京朝陽大學的有邱家薄（溥），北京中國大學的有郭清海、袁柏偉、黃紹周，還有就讀於華北工業專門學校的蔣延然。

¹⁰¹ 此外在戰後台灣省旅平同學會成立時，還出現部分學生名單。¹⁰²

就讀中學的有王康緒和楊英風（包括楊英風的弟弟英鏢、英欽）兩

⁹⁹ 梁永祿 (1946)，頁 4。

¹⁰⁰ 同註 91，頁 334。

¹⁰¹ 許雪姬訪問、紀錄 (2004)。

¹⁰² 如張輝南、鄞石城、李明德、陳魁元、袁楚偉，唯不清楚在何校就讀。

人都是北京日本中學校的學生，前者考上上海同文書院，因不願志願當兵而回北京，楊英風則考上東京美術學校，讀了一學期後回北京，卻因海上不安全及協助父親的事業，如為木偶戲製作布景，或製作戲票，而滯留北京。

另有一位引起福州水戶事件者，¹⁰³ 也在北京，準備協助日本政府勸說吳佩孚出山協助而未果，此人為李爐己。另林子瑾常年居北平經商，1937年初因母喪回台，¹⁰⁴ 而後再到北京，據其表弟吳子瑜言「北華自治之憲法係子瑾起草，經他修改」，而吳子瑜本人也定其旗為七星旗。¹⁰⁵ 這三人跟政治的距離較近。

(2) 就北京文化界來說，台籍人士在北京亦有一席之地。如江文也在北京的音樂活動相當多，他曾在新新戲院舉行兩場獨唱會，其舞劇「香妃傳」由本人指揮，在新新戲院演出；為山東茂莊學校募集基金舉行獨唱會；又舉行「中國歷代詩詞與民歌」獨唱會兩場，其眾多重要的作品都在這段時間完成，如1939年完成的《孔廟大晟樂章》。¹⁰⁶ 郭柏川則自1938年到戰後回台為止，每年必在端午節開畫展，在畫壇上有其角色。¹⁰⁷ 在文壇上張深切和張我軍二人之所以被列入落水作家，並排名第二十六、二十七，主要原因在張深切於1939年在日人堂ノ脇中佐的邀請下創辦《中國文藝》，擔任主編及發行人，10月奔父之喪回台，由張我軍代編，翌年該雜誌被日軍另一派系奪得，乃辭去主編任務。雖然他強調該刊旨在保持固有文化、鼓舞民心，¹⁰⁸ 劉心皇認為《中國文藝》旨在宣揚和平，而所謂的和平就是投降的和平，張深切便是宣揚這種日本軍的戰略；不過改由張鐵笙主編後「奴化性」更重。¹⁰⁹ 戰後他知道張深切是台灣人時，曾說如果他早知道，就不會將他列在落水作家

¹⁰³ 此事件發生於1932年1月，主要是日本福州小學教諭水戶一家死於非命（夫妻兩人，妻有孕），此為李爐己所為，主要是要配合日本軍隊造成事件，使日人勢力得以進兵福州、廈門，李被福州日本領事押解回台。（林知淵（1989），頁35-47。）

¹⁰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2004），頁44。

¹⁰⁵ 同註104，頁341。

¹⁰⁶ 同註23，頁140-142。

¹⁰⁷ 同註24，頁64-66。

¹⁰⁸ 陳芳明等編（1998），頁25-26。

¹⁰⁹ 同註97，頁2120。

之林。¹¹⁰ 後來張擬與周作人創辦一藝文雜誌而未成。他在北京的日子（1938-1945）也有不少創作，亦與張我軍合譯《現代日本短篇名作集》。張我軍在戰時的北京除了教書外，還翻譯不少日本名著，編寫《日本模範讀本》，並寫散文，他曾被推舉參加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得以認識如武者小路實篤等日本作家。

除上述三人外，還有鍾理和值得一提。前已述及他後來辭職在家專心寫作，前後有三年多的光陰，終於在 1945 年在北平馬德尊書店出版第一本創作集《夾竹桃》，搜羅這三年來的作品編成，內含〈夾竹桃〉、〈新生〉、〈游絲〉、〈薄芒〉四個短篇，鍾理和這個文學青年的成長就是在北京。

楊朝華則自 1932 年到北京以後逐漸從事電影業，先是在日本人開設的華北電影股份有限公司服務，¹¹¹ 1940 年 11 月，楊改任新新大戲院的經理，¹¹² 該戲院不只是放映如「木蘭從軍」、「播音台大血案」等影片，¹¹³ 還邀王先生（湯傑）、王太太（桑淑貞）等組成的「王先生滑稽演藝戲團」來表演，演出的戲目是「家庭糾紛」、「王先生粉紅色的夢」。¹¹⁴ 曾來台灣的朝鮮舞蹈家崔承喜也於 1942 年 7 月、1943 年 11 月在該戲院公演。¹¹⁵ 1944 年楊朝華組織了華光木偶劇團，經過三個月的操作、訓練，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在亞洲會館做首演，接著移到大光明戲院，¹¹⁶ 演出不惡，其中的布景、舞台都由其子楊英風負責設計、監督。1945 年 1 月 11 日木偶劇團又移到レックス演出，戲碼為「貂蟬」。¹¹⁷ 之前的 1 月 5 日因德國大使之妻生日，木偶

¹¹⁰ 同註 97，頁 274。劉稱：「後來，在台灣，看到張深切撰著的『我與我的思想』一書，方知他是台灣省台中縣人。可惜在當時，他並未說是台灣人。假如那時，他說是台灣人，便不會把他列敘到這裡了，因為當時的台灣，已被清廷割於日本四十餘年，在割讓的當時，有人表現忠貞，有人表現落水，已載之史冊，後來台灣出生的人，被迫為日人工作便不能以落水視之。」

¹¹¹ 張光正（2000），頁 523-528。

¹¹² 〈楊英風先生日記〉，昭和 15 年(1940)7 月 13 日

¹¹³ 同註 112，昭和 15 年(1940)11 月 24 日。

¹¹⁴ 同註 112，昭和 15 年(1940)12 月 28 日；昭和 18 年(1943)11 月 23 日。

¹¹⁵ 同註 112，昭和 17 年(1942)7 月 29 日；昭和 18 年(1943)11 月 23 日。

¹¹⁶ 同註 112，昭和 19 年(1944)11 月 30 日、12 月 3 日。

¹¹⁷ 同註 112，昭和 20 年(1945)1 月 1 日。

團應邀演出，前後四十五分，德國大使賞給了四千元的紅包。¹¹⁸ 而 11 日演出也告客滿，楊朝華在北京娛樂界也算有一席之地。

6. 戰後被逮捕的台灣人漢奸、戰犯

戰爭期間在北京的台人，雖然張深切說「這裏的同鄉，大抵冒稱福建人或廣東人，自食其力，以託庇日本勢力、占便宜為恥，這在全國可謂絕無僅有的特徵。」¹¹⁹ 又稱「八年之間，在北京的台灣人沒有犯案，沒有一個人受徵用，除楊正義一個人犯了姦殺案外，幾乎沒有人吃過官司。」¹²⁰ 他又說，他去華北前，陳炯要他「阻止台灣人協助日本」，¹²¹ 殊不知，這些說辭一點也沒有讓國民政府在逮捕漢奸、戰犯上縮手。先是 1945 年 9 月 27 日國民政府頒佈〈漢奸條例草案〉，11 月 23 日正式頒布〈處理漢奸條例〉十一條，12 月 6 日公佈〈懲治漢奸條例〉，1946 年 10 月 20 日又公佈〈戰爭罪犯審判條例〉，共三十五條，前者處分中國籍的助日者，後者處分日本人的侵華罪。

戰爭甫結束，台人立刻面臨「漢奸罪」，台人抗辯漢奸條例初始頒佈於 1938 年，是時台人非中華民國國籍，故不能判以漢奸罪；然而一直到 1946 年 11 月中央政府才通知各省對前被日人徵用的台人不能治以漢奸罪，但如在戰時利用汪偽勢力妨害他人權益，經受害人指證者，仍應交由軍法或司法予以議處。¹²² 換言之，此後除非在汪政權（包括華北政務委員會）任縣長以上者被逮捕外，一般被日軍征用者皆不在逮捕之列；但若該人被人告發，則適用〈戰爭罪犯審判條例〉來審判。

就目前所知，在北京的台人遭到逮捕的為江文也，罪名是他以音樂家的身份，受託為華北的「奴化教育」團體新民會譜〈新民會會歌〉、〈新民會會旗歌〉、〈大東亞民族進行曲〉而獲罪。這三首歌，前兩首為繆斌所作詞，後

¹¹⁸ 同註 112，昭和 20 年(1945)1 月 4 日、5 日。

¹¹⁹ 同註 17，頁 657。

¹²⁰ 同註 119，頁 678。

¹²¹ 同註 119，頁 635。

¹²² 丘念台 (1976)，頁 251。

者為楊壽明詞。在 1945 年抗戰勝利這年的一個冬夜，五、六個人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之名義來將江文也帶走，而被拘留在戰犯拘留所。江文也在獄中研究針灸，十個半月後以不起訴而無罪釋放。¹²³

當初引江文也入北平師範音樂系的該系系主任柯政和，原名丁丑，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及東京音樂學校，¹²⁴ 1923 年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音樂科任教授，發行《新樂潮》雜誌，又出版有關音樂的書百餘種，其中有譯述的，如《口琴如何吹奏》、編纂的有《初小模範唱遊教科書》四冊；但後來他兼任新民會中央指導部委員，又任新民會北京特別市總會事務局次長。¹²⁵ 就因為他在新民會的職位，使他在 1946 年與「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黎世衡、教育督辦李泰芬一起被捕，同被押解到南京，1949 年春天才由中共釋放。¹²⁶

除了這兩位教育界的人士外，華北治安軍第二集團司令黃南鵬，可想而知是在國民政府逮捕的行列中。但有關黃南鵬的資料不多，〈灌園（林獻堂）先生日記〉有如下記載可供參考：「〔陳〕哲民為介紹黃南鵬，汪精衛政府時他在北京為陸軍中將，光復後被監禁，及北京失守方釋放而來日本云云。」¹²⁷

謝廉清因曾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華北政務委員下任實業部商工科長、畜產司長職，位在縣長以上，因此戰後被捕入獄，在中共入北京前獲釋。¹²⁸

彭華英曾任北京市警局秘書，特務科、經濟科科長，1944 年轉任華北廣播部長，他因前述諸職而在 1945 年 12 月 18 日被捕，政府主要根究的是在秘書、特務、經濟科長任內有無危害中國老百姓，是否藉故逮捕無辜平民，至於廣播協會任內是否有宣傳不利中華民國之事？在廣播協會，彭並未有實權，且在任內亦未置產。彭認為「我自任各偽職以來，自問毫無對不著良心

¹²³ 吳韻真 (1992)，頁 13-14。

¹²⁴ 楊麗仙 (1986)，頁 174。

¹²⁵ 同註 51，橋川時雄 (1940)，頁 291-292。

¹²⁶ 同註 81，頁 183，註 29，引自金繼文未發表的手稿。若由謝介石、謝廉清的例子來看，應該是國民政府在 1948 年釋放，亦即「解放」前夕由傅作義釋放。

¹²⁷ 林獻堂著 (1950)，〈灌園先生日記〉。

¹²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 (2001)，頁 126。此訊息為本人至北京親訪謝之女兒，承其告知，謹申謝意。

事件，……毫無一點貪污情形。」經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於 1946 年 11 月 6 日以不起訴處分。此起訴書中有一觀點即「原檢舉案亦僅謂被告曾任偽職，並未指出其他犯罪證據，則該被告既為日本人民，當有盡忠國家之義務」一段，¹²⁹ 可見他是中央宣布被日人徵用的台人，不能以漢奸治罪後的直接「受益人」。

不過此尚非最終判決，再經保定綏靖署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做最終審，其不起訴處分，又經如下周折才告確定。「該案先是請國防部核示，要查明彭在警局期內有無罪行，應昭告民衆檢舉，並分請各有關機關協助調查以期詳密。」遂在北平刊登報紙，但迄未有人檢舉，「難以戰犯論處」，故予不起訴處分，到 1947 年 12 月 27 日始獲釋放。¹³⁰

辜炎瑞，戰後任瀋陽保安司令部《新生命報》駐平記者，他在 1947 年被曾新山（廣東人）向河北高等法院告訴辜曾逮捕他因而受害；趙小（筱）山（北平人）亦告被辜所捕，毆打成傷，經友人常績之借洋五千元始行營救出，分別指由張雄飛、常績之兩人為證人。但曾提出告訴後迄未到庭，亦未能提出被捕受害的證據；趙小山一案則亦查無實證，辜亦矢口否認上兩項指控，遂於是年年底予以不起訴處分，而於 1948 年 3 月 4 日獲釋。¹³¹

此外尚有林文龍、林廷輝、謝呂西¹³² 等著名人士被捕入獄。¹³³

除了戰犯、漢奸罪的威脅外，國民政府於 1946 年 1 月 14 日頒布「關於朝鮮及台灣人產業處理辦法」，並責令全國省市黨政機關執行辦理，處理辦法有二：一凡屬朝鮮及台灣之公產，收歸國有；二、凡屬朝鮮及台灣人之私

¹²⁹ 013.81/4212，民國 35 年(1946)4 月~36 年(1947)12 月，〈彭華英等戰犯審理案〉，藏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現已移轉檔案局，〈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35.11.6）

¹³⁰ 同註 129，〈保定綏靖公署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36.12.27）。本件資料為同仁羅久蓉小姐所提供，謹致謝意。

¹³¹ 同註 129。與彭華英同「案」。

¹³² 謝呂西生平不詳，據《九一八事變實錄》一書中記 1932 年 2 月 18 日，在關東軍操縱下，東北行政委員會開會並發表《獨立宣言》，湯玉麟（東北邊防軍熱河駐軍上將司令兼熱河省政府主席）派代表謝呂西參加會議，並代表湯在宣言上簽字。見馬越山（1991），頁 291。

¹³³ 同註 9，頁 6。

產，由處理局依照行政院處理敵偽辦法之規定，接收保管及運用。朝鮮或台灣人民，凡能提出確實籍貫，證明其未擔任日軍特務工作，或憑藉日人勢力，凌害本國人民，或幫同日人逃避物資，或並無其它罪行者，確實證明後，其私產呈報行政院核定，予以發還。」¹³⁴ 此令一出在大陸的台人莫不驚恐，以在北京的台人反應最為激烈。

此一辦法不合理之處有二：一是國民政府將台人和朝鮮人同等對待，似將台人當作外國人；一是不論私產來源，先將產業接收，能提出證明未協同侵略中國者，經行政院核定後才能發還，後者無異是不分青紅皂白視台人產業皆非法取得；且一經接收再要回更屬不能，何況誰來執行也是個大問題。當時台灣省旅平同鄉會及台灣革新同志會等團體，立刻奔走各方，希望取消該辦法，不僅直達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行政院長宋子文，還發給北平、天津、上海、福建、廣東及台灣有關機構和黨部，¹³⁵ 後來政府雖取消此辦法，¹³⁶ 但已對在大陸的台人造成傷害。

7. 結論

本文是筆者處理日治時期在「滿洲」（東北）的台灣人後的又一嘗試，由於戰爭期間在中國淪陷區活躍的台人都有被漢奸戰犯審判或被檢舉的可能，因此除了隨國民政府在重慶的台人外，對這段「中國經驗」大半是秘而不宣，再加上中國對漢奸資料進行控管，欲全面了解日治時期台人在海外的

¹³⁴ 楊肇嘉認為戰後政府對台灣人有三項失察：一是將居住於大陸淪陷區的台灣人和朝鮮人一樣視同「敵僑」待遇；二是將台灣暫劃為「特區」，設行政長官公署而不設省；三是政府遲遲不公佈恢復台灣人的中國國民的國籍。（楊肇嘉著（1967），頁 350。）此外台灣省旅平同鄉會也創刊了《新台灣》雜誌，在創刊號中分別刊出以下幾篇文章表示反對，如台灣省旅平同鄉會、台灣革新同志會，〈關於處理台灣人產業之意見書〉（創刊號）、林鷹（林子瑾），〈就台人產業處置而言〉（第三期），編輯部〈台灣人產業處理辦法實有難以忍耐之點：該省旅平同鄉會招待記者談話〉（創刊號），台灣重建協會，〈轉載為台灣同胞講幾句話〉（第二期）。

¹³⁵ 閩台通訊社（1946），頁 2-3。

¹³⁶ 經由行政院秘書處、軍事委員會發布該辦法停止施行之函，但日期明顯錯誤。見《新台灣》，第 3 期，頁 13。

活動相當困難。本文以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日本華北方面軍控制下的住在北京的台灣人為主題加以探討，主要在了解華北並未真正由稍後成立的汪記政權所掌控；住在北平（北京）的台人，有的是國民政府時期即住在北京，有些是自「滿洲國」移到北京，有些是 1938 年後才到北京就職；他們去北京的主要原因，除了個人因素外，北京是漢文化的代表地，有文化鄉愁的台人到北京後，即使在日本軍控制下，也認為是回到祖國，要報效祖國；北京的大學多，對受高等教育機會少的台人也充滿吸引力，何況學費又比日本便宜；而日人扶植的傀儡政權開場，需要各色人馬，正好給予台人就職的機會；亦有如蘇子衡等人為抗日而在北京蟄伏。當時前往者，沒有人會想到日後因時代改變而成為準漢奸、戰犯候選人。1930 年代在台灣到北京人大概在 60 人上下，到 1944 年才上升到 500 多人。據洪炎秋在〈平津台胞動靜概況〉一文中，稱在北平的台人將近 1,000 人，天津有 1,200 人，大學教員二十餘名，醫師八、九十名，鑛業工程師四五名，化學工程師七八名，電氣工程師六七名，在機關及公司中做事者 200 餘名，其他則從事大小商業，另有被日軍強為徵用的軍屬 95 名。¹³⁷

依〈1937-1945 在北京的台灣人〉表中，共搜集 92 個人的資料，其中約有 20 多人是 1938 年前往北京就職，至於就何職則不詳。依現在資料加以分析，占最多的是從事教育工作，但他們任教的「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1938 年升格）都是平津大學遷昆明、西安，另立西南、西北聯大後，日人再行恢復的學校，八年內這些偽學校生產出來的偽學生，在北大、清大等校史上是完全沒有其角色存在的，更遑論是在該兩校任教的教師，因此迄今尚未有人研究過。

台灣人中也有在傀儡政府任憲兵司令、事務局次長、河北定縣縣長、華北情報局局長，這些人雖「位高」（相對於其他台人）但權不重，真正的有權者是日本人。除了「官員」外，在當時華北文壇上張深切、張我軍都有其一席之地，尤其是張深切所主編的《中國文藝》是華北占領區下知名的雜誌，但因日本軍系間的競爭，該雜誌遂為他軍系所奪。

¹³⁷ 同註 88，頁 2。

這些在中國的台灣人，中國人如何看他們？台灣人又如何自己看自己，台灣人的認同又是什麼？這是一個複雜而人言言殊的問題，雖然台灣人在日本統治時期確實是在日、中兩國的文化、認同中擺盪；也就是在中日兩國的夾縫中生存，無法走出自己的路來。但這些在北京的台人，對其所從事的行業及其表現，都和在廈門、福州所謂的台灣浪人的表現不同，無疑的他們的素質較高。

戰後國民政府用漢奸、戰犯條例來審判台灣人，平心而論並不特別嚴苛，因為只要職位不高，沒有人檢舉，台人即不可能被逮捕。但是 1946 年初政府發布的「關於朝鮮及台灣人產業處理辦法」，此令一出，在中國的台人莫不驚恐；再加上漢奸、戰犯條例，似乎政府正在處分「台灣割讓」罪，幸得往後政府未認真執行，有戰犯罪嫌的也大半以不起訴處分！誠如劉心皇說的「……當時的台灣，已被清廷割讓於日本四十餘年，在割讓的當時，有人表現忠貞，有人表現落水，已載之史冊，後來台灣出生的人，被迫為日人工作便不能以落水視之。」¹³⁸

戰後在北京的台灣人紛紛準備回台，¹³⁹ 但也有些人滯留北京，以「迎接」不久到來的反右運動及文化大革命，江文也、柯政和、張秋海這些藝術家被鬥得死去活來，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深陷同樣的痛苦中，只是台灣人更慘，這是否是台灣人的原罪呢，¹⁴⁰ 如果他們回台灣成就是否更大。當江文也的妻子吳韻真看到郭柏川夫人寫的《柏川與我》的回憶錄時感慨係之，即知一個重大的決定將完全改變一生。

回到台灣的張深切、洪炎秋，在二二八時都失去了職位，張深切躲藏了半年，而劉捷陷入白色恐怖中，繫獄數年，不過比起那些滯京未歸者而言，亦算不幸中的大幸！

如果以洪炎秋在〈平津台胞動靜概況〉一文稱平津地區的台人做大學教

¹³⁸ 同註 97，頁 274。

¹³⁹ 〈平津台胞困苦，宜速設法接回〉，《民報》，（二），民國 35 年(1946)6 月 22 日載內載台灣省平津同鄉會聯合會會長洪炎秋之談話，平津台人欲回台，半年之中不斷向主席、省方陳情都沒有結果，最後向救濟分署求救才得陸續回台。

¹⁴⁰ 謝里法 (1984)，頁 117-119。

員有二十餘名，醫生八九十名，鑛業工程師四五名，化學工程師七八名，在機關及公司中做事者二百餘名，……」，本文所挖掘出來的資料，尚有不足之處，仍需繼續努力。

附錄

1937~1945 年在北京的台灣人

編號	姓名	出生	畢業學校	經歷	附註（書名：頁次）
1	王康緒			就讀北京日本中學校，後考上上海同文書院，因日本欲徵兵，乃再回北京。	〈楊英風先生日記〉，1943年7月10日
2	王阿本	1899		羅東人，1938年為就職而到北京。	J, 2, 2, 0, J13-7, 昭和13, 4~13, 6, 旅 112, 3205, 42.384 (藏日本外交史料館)
3	王英石		日本明治大學畢業	任職北京電信局。	劉捷，〈我的懺悔錄〉，頁96。
4	王衍明	1917		清水人，1938年北京就職。	J, 2, 2, 0, J13-7, 昭和13, 4~13, 6, 旅 112, 3283, 335.693
5	王慶基		中學畢業於台南長老教中學	在北京做事業(弟)	許雪姬訪問、記錄，〈林恩威先生訪問記錄〉，民國93年1月8日，于中研院近史所，未刊稿。
6	王慶勳			在北京做事業，並教日語(兄)	〈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
7	江文也	1910	東京武藏高等工學校電氣科畢業、東京音樂學校分教場聲樂科作曲科修了	淡水人，1938年3月應北京師範學院音樂學系主任柯政和之聘到北京，該系任作曲與聲樂教授，1945年被日籍系主任革職，在同鄉經營的「寶福煤礦公司」（在門頭溝）掛經理銜三個月。戰後因曾譜寫〈新民歌〉、〈大東亞民族進行曲〉而被逮捕，十個半月後釋放出獄。1947在國民中學任音樂教師，並應北平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主任趙梅伯邀請任該系教授，主授作曲法、和聲學、對位法等課程，1949年入中央音樂學院任教。1958年被撤銷教授職，1966文化大革命開始，遭抄家之痛，1970年下放河北保定勞改，1973年返北京，1978年平反，1983年逝世。	張己任，〈江文也：荊棘中的孤挺花〉，頁138~146，〈江文也年表〉

8	江子雲	1915		台中人，1938 年到北京就職。	J, 2, 2, 0, J13-7, 昭和 13, 7~13, 9, 旅 113, 568, 345.335
9	宋維屏			在北京與黃烈火兩人在北京組織公司營商，因不與日人合作而大虧損。日本投降時，在北平的張深切曾收容了六十幾個台灣的軍伕。安頓在學校裡住了幾個月，以便等船回台灣。當時張深切的經濟能力不太好，幸得黃烈火、宋維屏、張我軍等人的捐助，方得以供應這六十幾個台灣人吃住至返台。	《張深切全集》，卷二里程碑（下），頁 724~725；《楊基振日記》，頁 40,74,75,81, 82,86,92,121,145,156,219。
10	呂茂宗 (呂永凱)	1900	北京警官 高等學校 畢業	台北縣人，曾任汪精衛政權的立法委員，戰後回台，當選台灣省參議員。	洪炎秋，《閑話與常談—洪炎秋文選》，頁 245，〈「楊肇嘉回憶錄」序〉
11	吳琳 (吳巡華) (吳文龍)			與楊英風及台灣軍共 80 人，一起學習國語。	〈楊英風先生日記〉，1945 年 9 月 15 日
12	吳子瑜	1885		台中人，1937 年與同居人盧氏屏（1914 年生）到北京、天津、上海、滿洲國一帶營商，住新開路。1944 年回台。	J, 2, 2, 0, J13, 昭和 12, 7~12, 9, 旅 112, 1536.335.504.505
13	吳坤煌	1909	台中師範 畢業。日本 大學藝術 專門科、明 治大學肄 業	南投人，1932 年曾與王白淵等發行《台灣文藝》，戰爭中在北京新民學院教書。	劉捷，《我的懺悔錄》，頁 99
14	吳敦禮 (吳克竣)	1905	北平大學 法學院政 治系畢業， 日本東京 帝國大學 法學部大 學院畢業	大甲人，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編譯員，駐巴拿馬總領事館領事，後在外交部情報司辦事。日本占領北京後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外務局科長，華北政務委員會外務局科長，駐菲律賓領事館總領事，1941 年 11 月，駐日本橫濱總領事，兼任國立新民學院教授，著有《近代日本外交史研究》、《東亞情勢概論》，戰後回台。	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頁 139；《華北政府職員錄》，頁 183。

15	李光恩	1910		三峽人，1938 年到北京就職。	J, 2, 2, 0, J13-7, 昭和 13, 4~13, 6, 旅 112, 3232, 46, 229
16	李深泉	1912		台北人，1938 年到北京就職。	J, 2, 2, 0, J13-7, 昭和 13, 4~13, 6, 旅 112, 3210, 42.542
17	李 爐 杞 (又寫成爐己)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	台北人，日本佔領北京後到北京，改名李漢唐，協助製造偽政權，想拉吳佩孚出山加入汪政權，在日本投降前得病而亡。	《張深切全集》，卷二里程碑，(下)，頁 711
18	李金鐘	1904	早稻田大學政經科畢業	1921 年遭台北師範學校退學，後赴中國北京朝陽大學預科就讀，1924 年轉學至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科，1928 年回台入台灣新民報社，1935 年到天津《庸報》任北平支局長。日本佔領北京後，任臨時政府統稅局阿片科科長，2 年後轉到汪之國民政府服務。戰後回台，任職台灣合會公司。	興南新聞社，《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 435
19	李金樹	1907		台中豐原人，1938 年到北京就職。	J, 2, 2, 0, J13-7, 昭和 13, 7~13, 9, 旅 113, 581, 345.402
20	李增禮		東京外國語大學畢業	台南人，曾任華北開發公司副參事。	東南文化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南台灣人物誌》，頁 27
21	李崇仁		台大中文系畢業	彰化人，考上北大政治系，回台後改在台大就讀中文系，就職於彰化銀行。	〈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
22	林 馮 再 壽	1907		彰化人，1938 年到北京就職。	J, 2, 2, 0, J13-7, 昭和 13, 7~13, 9, 旅 113, 589, 345.487
23	林耀堂	1913	台北帝國大學理學部有機化學科畢業	霧峰人，1938 年到北京，1940 年在滿洲國大陸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室任副研究官，1944 年辭職到北大藥學系任教，回台後任台大化學系教授。	J, 2, 2, 0, J13-7, 昭和 13, 7~13, 9, 旅 113, 59, 345.608

24	林子瑾 (林少英) (林鷹)	1878		台中太平人，早年即到北京，汪精衛等人要拉吳佩孚出山，李燼己要爲此盡力，託林子瑾爲介，遂得認識。戰後曾在《新台灣》雜誌爲文。	J, 2, 2, 0, J13-7, 昭和13, 4~13, 6, 旅 112, 3272, 335.639
25	林文龍	1899	1926 年日本大學政治經濟學科畢業	畢業後到中國任陸海空軍副司令部參事、北平綏靖公署參事等職。七七事變後，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業部參事，1940 年後任華北政務委員會政務廳情報局長兼實業總署參事，東亞文化協會評議員和華北作家協會評議員。戰後在北京被捕，於 1946 年 4 月 22 日在北京接受第一次審訊。	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頁 258；《華北政府職員錄》，頁 182；《民報》，民國 35 年 4 月 25 日，1 版。
26	林茂生	1908	日本名古屋醫科大學畢業，醫學博士	嘉義人，1934 年畢業後，入勝沼內科學教室任副手、囑託，1939 年 6 月任中國青島鐵路醫院醫員，1940 年任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副參事，北京鐵路醫院院長，長辛店分院長兼醫長。	《華北政府職員錄》，頁 334。
27	林思平	1917	東京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畢業	嘉義大林人，1941 年畢業後因反戰爲日本警察監視，遂於 1943 年到山西太原，任鐵路醫院醫生，掩護中共地下黨取得藥品及醫療器材。1944 年回台奔喪，回太原後因在敵占區待不下，經中共安排到北京，並在 1945 年春天再到晉察冀解放區張家口市。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台灣同胞抗日 50 年紀實》，頁 541~547。
28	林恩威		台灣大學化工學系畢業	台中人，1942 年自日本到北京找三叔父林朝榮，以中國籍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學應用化學系，未畢業即終戰，於 1946 年底回台。	〈林恩威先生訪問記錄〉
29	林東波		台灣大學畢業	台中人，1942 年自台灣到北京找其姊林更味，投考北大未成，先入北支開發公司就職，第二年考上北大機械系，戰後回台，在台大續讀。	〈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
30	林華輝			就讀北師大英語系，其父在北京附近的某地當縣長。	〈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

31	林朝榮	1908	1934 年台北帝大地質學科畢業	台中人，1939 年入新京工業大學任教授，1940 任北京師範學院地學系教授，兼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1942 年任北京師範學院地學系主任，戰後回任台灣大學理學部教授。	林恩朋編，《林朝榮(戟門)先生紀念文輯》，頁 3。
32	林朝權	1906	1926 年日本法政大學專門部畢業，日本體育會體操學校畢業	台中人，1940 年到北京師範學校任體育系教授兼主任，為林朝榮兄。後到天津，一度擔任該地剿共委員會副主委。戰後回台，當選國大代表。中共建國後，林朝權到中國定居。	《滿華職員錄》，頁 931。
33	林權敏		早稻田大學法學部畢業	高雄人，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即到中國，曾任冀察戰區第十一軍上校團長，山西省警官學校教官，北平裕大煤礦公司總經理，軍委會平津區特派員，辦公處組長，1945 年曾與張深切一起被捕。戰後回台當選高雄市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	《南台灣人物志》，頁 101。
34	周水金	1919		台北人，1938 年到北京就職。	J, 2, 2, 0, J13-7, 昭和 13, 4~13, 6, 旅 112, 3206, 42.378
35	周合源	1903		台北艋舺人，1938 年到北京，在北京與人合作煤礦生意，規模很小，幾乎是流亡生活，1946 年回台，1953 年入獄，1965 年出獄。	《口述歷史》，9 期，民國 88 年 6 月，頁 125~149, 〈周合源先生訪問記錄〉
36	周壽源	1912		鹿港人，周天來子。1933 年到滿洲國，1940 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娶中國人為妻，在北京執業。戰後回台，在台北中山北路開業。	《楊基振日記》，頁 18, 82, 91, 94, 95, 156, 219, 562。
37	邱家溥 (溥)			就讀北京朝陽大學	〈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
38	邱鴻祥		日本法政大學畢業	台南人，日本法政大學畢業後到北京任燕京製紙株式會社勞務課課長二年。戰後回台，任台灣省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書記官三年八個月。	《南台灣人物誌》，頁 18。

39	柯政和 (柯丁丑)	1889 (1990)	日本上智大學、東京音樂學校畢業	1921年到北平，任北平師範學校音樂科教授，1930年轉到北京師範大學任體育音樂科教員。1938年音樂系成立，任系主任直到1940年。卸任後擔任音樂史、音樂概論的課，還兼任新民會中央指導部委員首都指導部次長，1940年任北京特別市總會事務局次長。日本戰敗後，他於1946年被捕，因係戰犯故與北師大校長黎世衡、教育督辦李泰芬被轉送南京，1949年北京解放後才出獄。文革期間遭批鬥，被送到寧夏回族自治區。1968年雙目失明，全身癱瘓，1979年亡故，一生編著百餘種音樂教材。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江文也紀念研討會論文集》，頁183。
40	洪伯仁		台大政治系畢業	北師大教授洪耀勳之子，考上北大政治系，回台後在台大政治系就讀。	〈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
41	洪炎秋	1902	北京大學教育系畢業	鹿港人，1923年到北京，畢業後擔任河北教育廳科員，而後到北平大學擔任註冊事務，高級中學成立後擔任過主任，也在農學院教日文，並在中國大學哲學系任教授。1937年被農學院命為留平財產保管委員，而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北京期間譯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英文法比較研究日本語法精解》。1945年回台，先在台北女師專任教務主任，後轉任台中師範學校校長，1947年因228事件被撤職，遂轉任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而後任國語日報社社長，1948年任台大中文系教授，1969年任立法委員，1980年去世。	劉紹唐，〈民國人物小傳〉，收入《傳記文學》，36卷5期，頁147~148；《華北政府職員錄》，1943年，頁106。
42	洪耀勳	1903	東京帝大文學部哲學科畢業又入大學院研究	台中人，於東京帝大畢業後，先在哲學研究所做進一步研究，而後回台北帝大任教。1937年北平被日軍占領後，辭講師職，而到北京師範學院任教授，亦在北京大學任教授，著有〈存在與真理〉一文，及《實存哲學諸問題》、《西洋哲學史》。	《滿華職員錄》，頁988。

43	袁伯偉			豐原人，就讀私立中國大學，回台轉讀台大。	〈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
44	梁永祿	1910		台南人，1938 年到北京，後自行開三安醫院，戰後被選為台灣旅平同鄉會會長。	J, 2, 2, 0, J13-7, 昭和 13, 7~13, 9, 旅 113, 571, 345.357
45	郭大茂	1909		台中人，1938 年為就職而到北京。	J, 2, 2, 0, J13-7, 昭和 13, 7~13, 9, 旅 113, 570, 345.354
46	郭清海	1924	中國大學	大甲人，因舅父吳敦禮在北京之故，遂於 1943 年到北京，後入私立中國大學政治經濟系肄業，1946 年回台。	許雪姬訪問、丘慧君記錄，〈郭清海先生訪問記錄〉，民國 84 年 3 月 15 日，於大甲吳宅，未刊稿
47	郭柏川	1901	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畢業	台南人，1921 年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在鄉任教，1926 年入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畢業後赴福建廈門繪畫學校任教授，1937 年自日本到中國東北旅行寫生近一年，1938 年到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任繪畫科西畫組教授，亦任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大工藝術講師。	《華北政府職員錄》，1943 年，頁 245。
48	陳五鸞	1908		台北蘆洲人，1938 年到北京就職。	J, 2, 2, 0, J13-7, 昭和 13, 4~13, 6, 旅 112, 3230, 46.195
49	陳天賜	1898	日本日本大學法律科畢業	1898 年生，台中梧棲人。1920 年赴中國，通過河北省考試委員會考試，取得任公安局長之資格，先後擔任過安次縣廊坊鎮、故城縣鄭鎮公安分局局長、密雲縣承審官、寧晉縣政府科長等職。1931 年在北平創設志誠實業有限公司，經營和濟印刷局、立達書局。盧溝橋事變後，因日軍占領北平而結束相關業務。1937 年任河北省定縣縣長，後因眼疾，不久去職。之後在北京當律師，並編《中華法令旬刊》。戰後回台，就職於高雄地方法院，擔任檢察官及推事，兩年後調任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檢察官，再過年餘就任屏東地方法院第一任院長。1951 年底轉任律師，1955 年因胰臟炎過世。	《楊基振日記》，頁 221,384,385。

50	陳哲民		廈門大學畢業	廖史豪之岳父。廈門大學畢業。後赴平、津一帶經商，戰後赴日。曾任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會議外交委員長，因主張台獨流亡日本。後在劉傳能的利誘與安全的保證下，同意放棄台獨運動返台。國安局急電東京督導組、駐日大使張厲生，發給護照，1956年6月22日脫離台灣民主獨立黨返台。因叛亂罪入獄的廖史豪也因此獲得減刑，並得以保外就醫。	《楊基振日記》，頁210,214,237,243,376,406,482,534。
51	張深切	1904	廣州中山大學肄業	台中人，1938年到北京，受邀前往北京藝專擔任訓育主任兼教授。1939年任台人旅平同鄉會會長，並籌組中國文化振興會，編《中國文藝》。1940年因藝專及新民學院內部鬥爭波及而去職，遂返台，10個月後再到北京，入新民會印書館任編輯。日本戰敗後，於1946年回台，受洪炎秋之邀任台中師範教務主任，因228而去職，此後不再涉足政治，1965年過世。	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卷二里程碑
52	張大模			宜蘭人，先在日本青森縣接受訓練，而後調到北平飛機場任整備兵（軍屬），在豐台軍拘留所服務。日本投降後，到同鄉楊朝華處投靠，原要在北平入空軍服務，未果，1946年7月回台。	〈楊英風先生日記〉，1945年8月31日，1946年2月20日
53	張星賢	1910	日本早稻田大學專門部商科畢業	台中人，1935年任職大連滿鐵，為地方課職員，1943年10月轉到華北交通會社所屬之北京鐵路局警察處服務。	興南新聞社，《台灣人士鑑》，頁250。
54	張世城	1912	台北開南商工商科畢業	豐原人，1934年到滿州新京，就職於財政部權運署，後因天寒及林朝榮的勸說，而於1941年到北京，先在楊朝華的新新戲院工作，後轉入日本人的華北電影公司。戰後被派到天津管理金剛電影院，1946年底回台。	許雪姬，《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頁370~372。

55	張仕勳	1915		台中人，1938 年到北京任職。	J, 2, 2, 0, J13-7, 昭和 13, 7~13, 9, 旅 113, 566, 345.304
56	張我軍 (張清榮)	1902	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板橋人，1924 年到北京，先在北京師範大學夜間部補習班學習，1926 年考入北京私立中國大學國文系，10 月轉入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日本佔領北京後，相繼在北京大學文學院日本文學系、北京大學工學院、外國與學院文學系任職，1942 年 11 月參加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戰後他因曾寫過〈台灣人的國家觀念〉一文，將台灣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分為第三種，然後論斷此種人係無國家觀念者，而被迫對青年謝罪。回台後先任台灣省教育會編纂組主任，1948 年任台灣茶葉同業公會秘書，1949 年任台灣省合作金庫專門委員，1955 年過世。	張光正，《張我軍全集》，頁 511~530 〈張我軍年表〉；鍾理和，《鍾理和日記》，頁 1。
57	張秋海	1899	東京高等師範國畫手工科畢業，東京美術學校西畫科畢業	蘆洲人，1931 年到霧峯為林獻堂畫像，1932 年棄畫從商，以賣茶而獲利不少，後因獲利減少，乃於 1938 年到北京。先住在郭柏川家中，1940 年入北京師範學院任工藝專修科副教授。戰爭後期棄教從商，而於 1945 年到天津，戰後未回台。1951 年到北京師大教學，文革時被關在自己任教的中央工藝美術學校的牛棚中，1971 年下放到河北獲鹿縣勞改，1974 年回北京，1988 年過世。	周文主編，《劉錦堂、張秋海生平及藝術成就研討會論文集》，頁 113~138。
58	張錦水			清水人（或梧棲人）中學在北京就讀，在北大法律系就讀。	〈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

59	彭華英	1895	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	梧棲人，1933年到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任社長秘書，後一度歸台。1939年10月任北京市警察局秘書、特務科科長、經濟科科長，1944年任華北廣播協會廣播部長，以迄戰爭結束。10月10日任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所屬北平電台總務科長，同年12月18日被捕。1946年11月6日經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於1947年12月27日由保定綏靖公署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檢察官予不起訴處分。	013.81/4212，35.4~36.12 彭華英等戰犯審理案
60	黃天生			台北人，為軍屬，日本投降後經張大模之介入住楊朝華家。	〈楊英風先生日記〉，1945年9月4日
61	黃少周			在北京就讀私立中國大學，回台後曾任公路局課長。	〈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
62	黃春江			在北京大學礦務系任教，回台後也在台大地質系任教	〈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
63	黃樹奎		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	彰化人，畢業後先在嘉義小梅、彰化開業，而後與堂兄黃子正到上海開業，後醫院因上海事變而毀，乃到滿洲開業，成為謝介石私人醫生及滿州國外交部囑託醫，在謝介石任駐日大使時亦隨行，謝卸任後，黃乃遷往北京，以事母至孝而聞名。	《張深切全集》，卷二里程碑（下），頁700~701。
64	黃爾竹	1901		台中人，1938年到北京就職。	J，2，2，0，J13-7，昭和13，7~13，9，旅113，568，345.326
65	黃南鵬	1902 (1899-1990)	南京國立東南大學畢業，1925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	彰化人，歷任參謀大隊長，團長，旅長，指揮所局長，臨時政府治安部建制局長兼華僑協會理事等職，1940年任陸軍少將，華北治安軍第二集團軍司令。戰後為蔣介石委任為北平憲警聯合會辦事處主任，後赴日本。	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史》〔增訂版〕，頁441；《華北政府職員錄》，頁305；《滿華職員錄》，頁922。

66	黃炳章	1914		彰化和美人，1938 年北京就職。	J，2，2，0，J13-7，昭和 13，7~13，9，旅 113，586，345.458
67	黃烈火			曾在滿洲國生活必需品組織會中擔任委員，後到北京經商，戰後回台，設立味全公司。	《張深切全集》，卷二，里程碑，頁 724。
68	辜炎瑞 (辜火城)	1913	法政大學 畢業	鹿港人，1938 年到北京，1939 年任北京警察局外事科科員，1940 年調外事局外勤局員，1941 年調內二區，1942 年調內四區，1943 年 8 月轉外二區，任首席局員。戰後任瀋陽保安司令部新生命報駐平記者，為北京市民趙小山所告，而於 1947 年 9 月 26 日被以戰犯逮捕，1947 年 12 月 25 日被保定綏靖公署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檢查官以不起訴處分，1948 年 3 月 4 日獲釋。	0.13.81/4212， 35.6~36.12，彭華英等戰犯 審理案
69	楊王氏 治	1910		彰化人，1938 年到北京就職。	J，2，2，0，J13-7，昭和 13，7~13，9，旅 113，560，335.712
70	葉兩端	1908		台北人，為從事製圖業而到北京。	J，2，2，0，J13-7，昭和 13，4~13，6，旅 112，419，47.604
71	楊克培	1903	日本大學 專門部政 治科畢業	彰化人，回台後參加台共，曾與謝雪紅同居，開設國際書局，一度為日人監禁。1938 年到北京，任河北定縣（一說澤縣）縣長，不肯替日人拷迫百姓，強徵軍糧，而被撤職。被撤職以後隱居北京，沉淪於鴉片，不知所終。	洪炎秋，《閑話與常談—洪炎秋文選》，頁 245。
72	楊 萃	1909		員林人，1938 年到北京就職。	J，2，2，0，J13-7，昭和 13，7~13，9，旅 113，583，345.422

73	楊朝華 (子楊英風等三人)	1899	上海暨南大學商科專修科畢業	宜蘭人，畢業後本欲回台繼承父親留下的製糖工場，但糖場為台灣總督府所併，遂往東北投身商界，由台灣販運土產鮮貨到東北、華北各地銷售，而後改在滿州經營電影業，並任東省特別區地政管理局調查主任。九一八事變後移居北京，仍在平、津一帶從事電影業，1942年經營新新戲院。終戰前組織木偶戲團巡迴平津一帶演出。此外在天津設華道商行，戰後被委為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部秘書，又在江南經營米業。	〈楊英風先生日記〉，1946年2月15日，抄「父親之經歷—抄崔公睿之報告文」
74	楊基振	1911	早稻田大學	清水人，1934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而後入大連滿鐵本社鐵道部服務，1938年轉入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天津鐵路局貨物科長，後陞運賃係（運費組）主任，1940年到北京本社服務，1942年升到管事，運輸局賃率主任，1945年5月辭職，而入啓新セメント唐山工場任副廠長，後因被當成漢奸，為躲避追捕，回到北京避禍，但妻子卻因病死於唐山，1946年5月回台。他也留下戰前、後的日記，由1944年10月日開始，是相當貴重的史料。	黃英哲、許雪姬，〈楊基振日記：台灣人・日本鐵道キャリヤとして時下の北京に生きる〉，《植民地文化研究》，第二號，2003年7月，頁192~200。
75	楊基榮			清水人，戰後曾任日人集中營的管理，回台後日任教師大體育系。	〈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
76	葉日旺	1921		中壢楊梅人，1938年到北京就職。	J，2，2，0，J13-7，昭和13，4~13，6，旅112，3255，735.730
77	廖炳輝	1907		台中人，1938年到北京復任。	J，2，2，0，J13-7，昭和13，7~13，9，旅115，566，345.309
78	廖乾三	1913		台中人，1938年到北京就職。	J，2，2，0，J13-7，昭和13，4~13，6，旅112，3273，335.652

79	蔣延然			就讀日本人辦的華北工業專門學校。	〈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
80	鄧火土	1911	台北第二師範學校講習科畢業	台北人，1930 年畢業後，任老松公學校訓導(1931~1938)，1933 年 3 月取得甲種本科正教員證書。日姓田村，任北京日本中學校生物科教師，住日本宿舍，戰後宿舍被接收，乃到楊朝華處住，回台後任職台大。	〈楊英風先生日記〉，1946 年 4 月 4 日；張璿文，《校園萬花筒》，頁 33。
81	劉捷	1911	東京目白商業學校夜間部畢業，日本明治大學畢業	屏東人，1934 年畢業後，原任職《台灣新民報》，1937 年到北京定居，任職於北京市警察局，做電影檢查的工作。後因在新民學院任教的吳煌坤推荐，到北京第四中學擔任日語教師，爾後到徐州蘇北警察教練所任日文老師，1940 年後改任徐州市警察局第二分局長，再轉任警察總局任保安科長，最後擔任蘇北特別行政區長官郝鵬舉的秘書，兼徐州日報社長，戰後回台。	劉捷，《我的懺悔錄》，頁 89-118。
82	賴火明	1914		台中大屯人，1938 年到北京就職。	J，2，2，0，J13-7，昭和 13，7~13，9，旅 113，56，335.723
83	賴大振	1921		台中人，1938 年到北京就職。	J，2，2，0，J13，昭和 13，4~13，6，旅 112，3273，335.645
84	賴金墾	1914		台中人，1938 年到北京就職。	J，2，2，0，J13-7，昭和 13，4~13，6，旅 112，3273.335.646
85	謝廉清	1903	北京朝陽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	畢業後入天津地方法院任書記，1927 年任北京郁文大學教授，翌年任中國陸軍大學教官，1930 年任陸軍三十三軍政治訓練處主任，後回台任職台灣新民報社。1937 年退社到天津，入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任實業部商工科長，1938 年 11 月與殷同爲了經濟使節到東京協議，再升任畜產司長。戰後被捕入獄，中共解放北京後獲釋，1961 年亡故。	《台灣人士鑑》，昭和 18 年版，頁 194。

86	鍾逸民 (鍾材上)		日本京都藥學專門學校畢業	高雄人，1943年畢業後到北京任西城醫院任藥劑師約1年；1944年轉任青島新生製藥化學工廠技師半年，並任通譯。戰後以其曾任憲兵隊通譯，疑有犯罪行為而被檢舉，經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偵查，以不起訴結案。	案卷號：998，鍾逸民（台灣高雄）戰犯案
87	鍾理和	1915	滿洲自動車學校畢業	美濃人，畢業於1940年任職奉天交通株式會社，1941年轉居北京，應聘為華北經濟調查所翻譯員，以後辭職，開煤炭店維生，後來專事寫作，生活由表兄接濟。1945年在北京出版第一本創作集《夾竹桃》。1946年回台，任屏東內埔初中代用國文教師，1947年在內埔初中教書，而後因病卸職在家從事寫作，1960年過世。	高雄縣立文化中心，《鍾理和全集》6，頁227~233，〈鍾理和生平與著作刊登年表〉
88	顏春輝	1906	燕京大學醫學博士	台南人，台南長老教中學畢業後，考取福州協和大學，翌年轉北京協和醫院，研究細菌免疫學，以後該院併入燕京大學，隨即畢業。1928年得國大醫學博士學位，1936年赴加拿大深造，並考查歐美各國公共衛生，回中國後在燕大執教10年，後任北京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主任教授，並兼任北平衛生檢驗人員訓練班。1946年回台考察醫事設施，1947年任台灣省政府衛生處長。	《台灣名人傳》，頁208~209。
89	簡坤火	1915		台中人，1938年到北京就職。	J，2，2，0，J13-7，昭和13，4~13，6，旅112，3281，335.658

90	藍振德	1900		嘉義人，畢業於香港拔萃學院，1926年復畢業於日本東京專大政治經濟科。曾任上海持志大學教授、財政部山東捲煙統稅局科長、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上校專任教官、天津市政府公安局秘書、北京市政府警察局諮議、天津特別市公署公安秘書、北京市政府警察局諮議、天津特別市公署警察局特務科長同公署公安秘書、北京市政府警察局諮議、天津特別市公署警察局特務科長同公署處外事處科長、外事處處長等職。1939年任天津特別市公署社會局長，兼任天津特別市公署臨時檢疫委員會委員、天津市水災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總務部長、華北救災委員會天津分會常務委員兼賑務處處長、天津特別市銀行理事等，其一生中有一事足敘者，1938年7月檢舉共產黨偽造紙幣300元，得到天津憲兵隊長大野廣一大佐特別賞金。	《楊基振日記》，頁72,464,492。
91	鍾柏卿			醫師。曾於戰前在北京大學醫學院擔任助教。與蘇子衡等人均有往來。	《楊基振日記》，頁155,206,211,236,242,433,434。
92	蘇子衡	1905	日本東北帝國大學工學院畢業	彰化人，1941年到北京任北京大學理學院副教授，參加中共晉察冀城工部工作，主要任務是安排相關人員到中共抗日基地。經由其手安排的不少，1945年8月蘇也前往，10月底再回北平。戰後任大連大學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顧問。	《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頁584~587。

參考文獻

- 中村孝志 (1985)，〈廈門の台灣籍民と三大姓〉，《南方文化》，12。
-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 (1998)，《台灣同胞抗日五十年紀實》，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
-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1997)，《中國抗日戰爭大事記》，北京：北京出版社。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 (1981)，《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三），台北：該會。
- 不著編人，《華北政府職員錄》，原書不全，藏中國瀋陽遼寧圖書館。
- 王家誠 (1998)，《郭柏川的生平與藝術》，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
- 文英 (1998)，〈奔向抗日根據-晉冀察〉，收入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台灣同胞抗日五十年紀實》，頁 595，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
- 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史》編寫組 (1999)，《北京史》增訂版，北京：北京出版社。
- 丘念台 (1976)，《嶺海微飆》，再版，台北：中華日報叢書。
-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1999)，《江文也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該中心。
- 竹內清 (1940)，《事變と台灣人》，東京：日滿新興文化協會。
- 竹內實 (1999)，《北京：世界の都市の物語》，東京：文藝春秋。
- 吳玲宜 (1992)，〈江文也生平與作品〉，收入張己任編，《江文也紀念研討會論文集》，頁 161，台北：江文也紀念音樂週籌備委員會。
- 吳韻真 (1992)，〈伴隨文也的回憶〉，收入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香港民族音樂學會，《民族音樂研究第三集：江文也研討會論文集》，頁 13-14，香港：該會。
- 呂芳上 (1971)，〈抗戰時期在祖國的台灣光復運動〉，《新知雜誌》，1：5，頁 21-28。
- 呂芳上 (1973)，〈台灣革命同盟會與台灣光復運動〉，收入《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3，頁 255-316。

- 李雲漢 (1971),《國民革命與台灣光復的歷史淵源》,台北:幼獅書店。
- 林德政 (2001),〈抗戰期間台籍人士在重慶的活動〉,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 27 輯,台北:該中心。
- 林蘭芳 (2003),〈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台灣的電力事業〉,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部博士學位論文,頁 416-417。
- 林知淵 (1989),《政壇浮生錄—林知淵自述》,福建文史資料第 22 輯,福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 林恩朋編 (1989),《林朝棨(戟門)先生紀念文輯》,台北:自刊本。
-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 (2004),《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 44,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 (2001),《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 林獻堂著 (1950),〈灌園先生日記〉,未刊稿。
- 周文主編 (2000),《劉錦堂·張秋海生平及藝術成就研討會論文專集》,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
- 東南文化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1956),《南台灣人物誌》,台中:東南文化出版社。
- 洪檣(洪炎秋)(1946),〈平津台胞動靜概況〉,《新台灣》,創刊號,頁 2。
- 洪炎秋 (1996),《閑話與常談—洪炎秋文選》,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 若林正文 (1987),〈『台灣籍民問題』初探〉,《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外國語科紀要》,第 34:5。
-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等 (1992),《民族音樂研究第三輯、江文也研討會論文集》,香港:該中心。
- 高雄縣立文化中心 (1997),《鍾理和全集》,高雄:該中心。
- 秦賢次 (1995a),〈張我軍及其同時代的北京台灣留學生〉,收入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召開的「張我軍學術研討會」論文。
- 秦賢次 (1995b),〈《新台灣》導言〉,收入《新台灣》,頁 5-9,台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不著複刻時間。
- 馬越山 (1991),《九一八事變實錄》,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 梁永祿 (1946)，〈請詢問這個女孩子以測知台胞愛國的熱烈〉，《新台灣》，創刊號，頁 4。
- 梁華璜 (2001)，《台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
- 張己任 (2002)，《江文也：荊棘中的孤挺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張光正 (2000)，《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出版社。
- 張瑞成 (1990)，《台籍志士在祖國的復台努力》，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 張璿文 (2004)，《校園萬花筒》，台北：台北市政府教育。
-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記錄 (1994)，〈李太平先生訪問記錄〉，收入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歷史》，5，頁 87-89。
- 許雪姬訪問、丘慧君紀錄 (1995)，〈郭清海先生訪問記錄〉，於台中縣大甲鎮郭宅，未刊稿。
- 許雪姬 (2003)，《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記錄 (2004)，〈楊藏嶽先生訪問記錄〉，收入《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頁 440。
-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記錄 (2004)，〈林更味女士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頁 373。
-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記錄 (2004)，〈林永倉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頁 348。
- 許雪姬 (2004)，〈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台灣醫生〉，《台灣史研究》，11 卷 2 期，頁 1-75。
- 許雪姬 (2007)，〈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其認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7 期，頁 57-117。
- 曹子西 (1994)，《北京通史》第九卷，北京：中國書店。
- 清水晶 (1995)，《上海租界映畫私史》，東京：新潮流。
- 陳漢光訪問 (1991)，〈林熊祥先生訪問記錄〉，收入黃富三等編，《台灣近現代口述歷史》，頁 247，台北：林本源文化教育基金會。

- 陳儀深訪問 (1997)，〈周合源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9 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 陳芳明等編 (1998)，《張深切全集》，台北：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
- 陳萬益編 (1996)，《閑話與常談—洪炎秋文選》，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 黃英哲、許雪姬 (2003)，〈楊基振日記：台灣人・日本鐵道キャリヤとして時下の北京に生きる〉，《植民地文化研究》，2，頁 192-200。
- 楊永彬 (1996)，〈台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關係—1895 年-1905 年〉，台大歷史所碩士論文，頁 71-74。
- 楊基振 (2007)，《楊基振日記》，台北：國史館。
- 楊肇嘉 (1967)，《楊肇嘉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
- 楊麗仙 (1986)，《台灣西洋音樂史綱》，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
- 閩台通訊社 (1946)，《台灣政治現況報告書》，香港：閩台通訊社。
- 甄國憲編 (1994)，《北京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
- 劉心皇 (1980)，《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台北：成文出版社。
- 劉捷 (1998)，《我的懺悔錄》，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 橋川時雄 (1940)，《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
- 韓國鑽、林衡哲 (1984)，《音樂大師江文也》，台北：敦禮出版社。
- 謝里法 (1984)，〈斷層下的老藤—我所找到的江文也〉，收入韓國鑽等，《音樂大師江文也》，頁 117-119，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
- 鍾淑敏 (1999)，〈台灣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之研究—以情報體系為中心〉，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7 輯，頁 695-733，台北：中研院社科所。
- 鍾淑敏 (2004)，〈日治時期台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收入《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頁 400-451，台北：東華書局。
- 羅久蓉 (1993)，〈抗戰勝利後教育甄審的理論與實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頁 205-231。
- 蘇子蘅 (1998)，〈這裏通向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收入《台灣同胞抗日五十年紀實》，北京：中華婦女出版社，頁 585。

Heinrich Schnee 著、今森誠也譯 (2003)，《「滿州國」見聞記：リットン調査團同行記》，東京：株式會社講談社。

Colin Ross 著、今森誠也譯 (2003)，《日中戰爭見聞記》，東京：株式會社講談社。

檔案資料

K,3,7,0,9,中國並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關係一件，第 19 冊，昭和 19 年（1944）4 月 1 日，〈中華民國在留本邦人及第三國人人口概計表〉，大東亞省總務局調查課編製，昭和 19 年（1944）4 月，〈領事館管內別在留本邦人人口〉，北京爲 548 人，之前爲 560 人。

K,3,3,3,0,6-1,在外帝國公館ノ所在位置並在留民分布狀態其他ニ關スル調査，中國ノ部（滿蒙ヲ除外），機密第 486 號，昭和 3 年（1928）4 月 21 日，在支那特命全權公使芳澤謙吉致外務大臣田中義一，〈在北京公館ノ所在地滞在留民分布狀態其他ニ關シ報告ノ件〉；機密第 486 號，昭和 3 年（1928）2 月 21 日，在福州總領事西澤義徵致外務大臣男爵田中義一殿，〈在支各公館ノ所在位置並在留民分佈狀態其他ニ關シ報告ノ件〉。

K,3,7,0,9,〈中國並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關係一件〉（昭和 6 年度），昭和 6 年（1931）12 月末日〈支那在留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第二十四回〉，第二表〈關東州並滿洲在留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第五表〈支那本部並香港、澳門在留本邦人外國人及中國人口統計表〉

k,3,7,0,9,〈中國及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關係一件〉昭和 8 年度（1933），〈五、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在留本邦人人口統計表〉

k,3,7,0,9,〈中國及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關係一件〉昭和 9 年度（1934），〈五、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在留本邦人人口統計表〉

k,3,7,0,9,〈中國並二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關係一件〉昭和 11 年度(1936)，第 1 卷，《昭和 11 年 10 月 1 日現在》〈滿洲國及中華民國在留本邦人人口概計表〉

k,3,7,0,9, 〈中國並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關係一件〉，昭和 12 年（1937）1 月-12 月，〈七、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在留本邦人人口概計表〉，當時天津還有 76 人，灤縣 2 人，山海關 5 人，上海 12 人。

k,3,7,0,9, 〈中國並滿洲國ニ於ケ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關係一件〉，昭和 13 年（1938）1 月，〈北京日本人許可營業調查表〉。

013.81/4212，民國 35 年(1946)4 月~36 年(1947)12 月，〈彭華英等戰犯審理案〉，藏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現已移轉檔案局，〈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35.11.6）、〈保定綏靖公署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36.12.27）。

日本外交史料館旅券資料 J2,2,0, J13-7, 9, 旅 113,560,335.712

〈平津台胞困苦，宜速設法接回〉，《民報》，（二），民國 35(1946)年 6 月 22 日。

〈楊英風先生日記〉，昭和 15 年(1940)7 月 13 日。

林獻堂著(1950)，〈灌園先生日記〉。

許雪姬訪問、丘慧君紀錄 (1995)，〈郭清海先生訪問記錄〉，於台中縣大甲鎮郭宅，未刊稿。

許雪姬訪問、紀錄，〈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2004)，于中研院近史所，未刊稿。

Taiwanese in Beijing from 1937 to 1947

Hsuch-Chi Hsu*

Abstract

Overseas activities of Taiwanese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Taiwan's history. Researches made so far were mainly about Taiwanese residing in southeast China, Chongqing, and Manchuria. Little effort has been made on studying lives of Taiwanese in Beijing. During the eight year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1937-1947), there were about 500 Taiwanese living in Beijing (北京). This essay explained why they were there, what occupations were they engaged in, and what happened to them after the war. Materials reviewed in this study included travel certificates of Taiwanese kept by the diplomatic record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nnual statistics on overseas travel of Japanese (including Taiwanese and Korean) compil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s well as diaries, novels, articles and oral history written and narrated by Taiwanese concerning their experiences in Beijing between 1937 and 1945.

Keywords: Beijing, Overseas activities of Taiwanese

* Research Fellow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mail: mhsoat@gate.sinica.edu.tw.